



東方考古研究通訊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第5期



《东方考古研究通讯》编辑委员会

白云翔 陈星灿 方 辉 宫本一夫 靳桂云
栾丰实 佟佩华 王 青 文德安 赵 辉

主 编：方 辉

封面设计：韩小囡

本期编辑：陈淑卿 王 芬 陈雪香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编：250100

E - mail：arc@sdu.edu.cn

网址：www.arc.sdu.edu.cn

电话：0531-88369989/88366149

传真：0531-88565268

2005 中国·日照龙山时代与早期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ongshan Time and Early States, 2005. Rizhao, China

主办：山东大学 日照市人民政府

承办：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日照市文化局

时间：2005 年 10 月 24 日—27 日

组委会

主任：展 涛 山东大学校长
于建成 日照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主任：于修平 山东大学副校长
李 敏 中共日照市委副书记
徐 清 日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成 员：栾丰实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
郭长海 中共日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赵 斌 中共日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日照市文化局局长
来永明 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方 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同华 日照市公安局副局长
林玉营 日照市文化局副局长
杨英善 日照市文化局纪检组长
孙正武 日照市文化局副局长
李铁业 日照市文化局助理调研员
杨淑光 日照市卫生局副局长
邹大勇 日照市外事办副主任
蒋万超 日照市人民政府对外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孟庆谦 日照日报社副总编
相振波 日照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董书涛 日照市博物馆馆长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赵 斌、来永明、方 辉



大会开幕式



与会代表参观遗址



中共日照市委副书记李敏同志致辞



山东大学副校长于修平同志致辞

中共日照市委副书记李敏同志开幕式致辞

尊敬的展涛校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十月的日照，秋高气爽、阳光明媚。

由山东大学、日照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日照市文化局承办的“2005 中国·日照龙山时代与早期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隆重开幕了。在此，我代表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和全市 280 万人民，向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嘉宾、中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日照，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这里的史前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早在数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陵阳河、尧王城、丹土等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图象（文字）符号，被史学界认为是古代文明的火花。日照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王湘、梁思永、尹达等发现、发掘了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拉开了日照地区考古工作的序幕。同时期还发现了丹土、尧王城等重要遗址。建国后，又发现东海峪遗址。这四处遗址，因有重要发现而为中外考古学界所关注。1995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东大学和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专家、学者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以两城遗址为中心的区域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调查、勘探、发掘，积累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今天中外专家聚集一堂，进行专题交流、研究、探讨，必将进一步确立日照地区龙山时代文明在中华 5000 年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日照，是一座环境优美的海滨生态城市。这里，自然风光秀美，有碧海、蓝天、金沙滩这些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素有“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之美誉，城市空气质量、生活饮用水质量、近海水域水质均保持国家一级标准，是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市、国家环保重点城市、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这里拥有日照、岚山两个国家一类对外开放的深水大港和全国第二大煤炭码头、我国北方最大的液体化工码头，港路优势突出，可以发展大进大出的临港产业，有利于形成产业集聚。目前，以冶金、粮油加工、液体化工、木制品加工、造纸和能源为主的六大临港产业初具规模，一批投资过百亿元的大型项目正在建设。不久的将来，日照将成为山东乃至中国最大的“钢铁城”、“木浆城”、“造纸城”和重要的粮油加工基地、液体化工生产基地、能源工业基地、木制品加工基地、机械工业基地。

日照，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时尚城市。这里拥有亚洲第一、世界领先的国家水上运动基地。今年 8、9 月份，在这里举行了 2005 年欧洲级帆船世界锦标赛、世界帆板精英赛和国际游艇展览交易会。今后几年，日照市还将承办 2006 年国际 470 级世界帆船锦标赛、2007 年首届中国水上运动大会、2008 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热身赛等重要赛事活动，进一步打造“水上运动之都”的品牌。这里，刚刚崛起的大学科技园，成为日照市人才的摇篮，已建成高等学校 6 所，入住教师、学生 5 万余人。

各位嘉宾、朋友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日照市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建设“国际水准的滨海城市”的战略构想，既需要经济的跨越发展，也需要社会文化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必将提高日照市的知名度，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带动全市经济、文化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最后，预祝“2005 中国·日照龙山时代与早期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

山东大学副校长于修平同志开幕式致辞

各位来宾：

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时刻，由山东大学和日照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05 中国·日照‘龙山时代与早期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碧海蓝天的美丽海滨城市日照如期开幕了。首先，我代表山东大学对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祖国宝岛台湾以及大陆各地的与会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具体承办此次会议的日照市政府表示诚挚的感谢！

据我的同事们讲，中美考古学家在日照地区的考古调查已经进入到第十一个年头，发掘工作也已经结束，并已进入报告编写阶段。常言道，十年磨一剑。今天，他们将把十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共享，期望在与大家的交流中共同进步。

今年是山东大学合校的第五年。五年来，山大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山大考古学科的发展，也是新山大发展的一个缩影。五年来，我们成立了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投入专项资金，建立起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实验室，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我们以“立青讲座教授”和“流动岗位教授”的名义，每年邀请高水平的国际著名学者来我校讲学，开展合作研究，并选派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考古系师生的知识结构得到很大提升，也扩大了我校考古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

我校考古学科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离不开国内外兄弟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支持，包括在座各位以及你们所在单位的支持。像我们在日照进行的长达 10 年的合作项目，自始至终得到日照市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日照文物部门，实际上也是这项合作项目的直接参与方。

这是我们东方考古中心成立以来所举办的第二次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是在两年前的济南山大校园。相信这样的会议将来还要经常举行。希望有机会在美丽的泉城济南我们的主校区，在我们山东大学的分校、另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与各位再次会面。

最后，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日照市副市长解世增同志闭幕式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外国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经过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和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2005 中国·日照龙山时代与早期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我代表日照市委、市政府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外专家学者以日照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为资料，就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学术课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日照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地区，区域内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从出土的大量资料证明该地区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龙山时代，日照区域内古城古国的出现，应该是中华最早的国家或者是国家的雏形。作为东夷文化的先进代表，日照地区在中华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上以及中华古文化的形成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古老文明的日照再创辉煌。乘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东风，进一步宣传推介日照，提高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扩大改革开放，加快新兴港城的建设步伐，为建设“美丽富强、文明开放”的新日照而努力奋斗。

各位专家、学者，根据大会议程，明天各位将返回本地，预祝路途顺利，心情愉快！

谢谢大家！

2005 中国·日照龙山时代与早期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与会代表名单

加里·费曼 Gary Feinman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 The Field Museum in Chicago, USA
琳达·尼古拉斯 Linda Nicholas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 The Field Museum in Chicago, USA
文德安 Anne Underhill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 The Field Museum in Chicago, USA
焦天龙 Jiao Tianlong 美国旧金山博物馆 Bishop Museum, USA
宫本一夫 Kazuo Miyamoto 九州大学人文学部 Kyushu University
伊藤广树 九州大学人文学部 Kyushu University
吴江原 Oh, Kang won 高句丽研究财团 Korgory Research Foundation
崔钟赫 Choi Jong Hyuk 韩国文物研究院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Korea
卢赫真 Hyuk-Jin Ro 韩国翰林大学 Hallym University, Korea

高广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赵志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孔昭宸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刘长江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杨晓燕 中国科学院人文学院 李永迪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佟伟华 中国国家博物馆 谷艳雪 文物出版社
林留根 南京博物院 张敏 南京博物院
宋建 上海博物馆 翟扬 上海博物馆
段宏振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赵新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宋建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薛新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张学海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美英 台湾南华大学 夏正楷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
燕生东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陈洪波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王建华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霍东峰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水涛 南京大学历史系 裴安平 南京师范大学
于修平 山东大学 孙凤收 山东大学国际处
蔡凤书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于海广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栾丰实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靳桂云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目 录

1998~2001 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栾丰实(1)
山东日照两城龙山文化遗址围城遗迹的发现与发掘.....	于海广(5)
1995~2004 年日照地区系统考古调查的新收获.....	...方辉等(7)
1930 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发掘与调查工作.....	李永迪(13)
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木材分析.....	靳桂云等(14)
丹土与两城镇遗址出土玉器研究.....	燕生东等(15)
科学思潮与早期国家探源.....	陈淳、陈洪波(18)
城市·都城·国家——探索早期国家形成进程的途径之思考.....	段宏振(21)
山东先史时代所见礼制的起源.....	宫本一夫(22)
20 世纪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	朱乃诚(23)
海岱龙山文化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古代文明若干因素的萌芽.....	高广仁(25)
龙山时代——古国时代.....	张学海(26)
黄淮地区史前考古新收获与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	林留根(27)
酋邦社会变化过程的考古学观察——玻利尼西亚酋邦考古学研究的启示.....	焦天龙(29)
青铜器~初期铁器时代辽东东部地区社会及其进程过程.....	吴江原(30)
韩国中部江原道考古学文化及其社会发展进程.....	卢赫真(31)
史前财富私有化的起源——湘西北澧阳平原个案的研究.....	裴安平(32)
清凉寺墓地的发掘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研究.....	宋建忠、薛新明(36)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发现与早期夏文化研究.....	方燕明(37)
山东北部先秦时期的海盐业与社会演变.....	王青(38)
日照地区的区域性系统调查：龙山时代政治组织的模式.....	文德安(40)
全球性的观察：系统的聚落模式调查对复杂社会研究的革新.....	加里·费曼(41)
海岱地区以城为中心的聚落形态.....	宋建(41)
山西垣曲盆地的聚落考古研究.....	佟伟华(42)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许宏(44)
中国北方干旱区考古遗址植物遗存及对环境变化的探讨.....	孔昭宸(45)
对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植物遗存研究的思考和讨论.....	刘长江(46)
基于小流域系统的史前人地关系研究.....	夏正楷(47)
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尺度及其在环境考古中的应用程度.....	杨晓燕(48)
史前东方海岸变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高蒙河(49)
海岱地区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旱稻混作农业经济.....	赵志军(50)
史前猪的圈养方式刍议.....	霍东峰(51)
日照地区龙山时代考古世纪述略.....	杨深富(52)
日照地区龙山文化建筑墙体的营建技术.....	刘红军(53)

Contents

- 1 The Main Discoveries of the Excavation at Liangchengzhen Site during 1998-2001
Luan Fengshi et al.
- 5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the Circled Trenches at Liangchengzhen Site, Rizhao, Shandong
Yu Haiguang
- 7 New Discoveri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Rizhao Area during 1995-2004
Fang Hui et al.
- 13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at the Sites of Longshan Period in Shandong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in the 1930's
Li Yongdi
- 14 Wood Analysis at Liangchengzhen Site, Rizhao City, Shandong
Jin Guiyun et al.
- 15 A Study on the Jade Artifacts from Dantu Site and Liangchengzhen Site
Yan Shengdong et al.
- 18 Scientific Thought and the Origin of Early States
Chen Chun and Chen Hongbo
- 21 City•Capital•State: A Study on the Way of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Early States
Duang Hongzhen
- 22 The Origin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the Pre-historic Times in Shandong Area
Kazuo Miyamoto
- 23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in Haidai Area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Zhu Naicheng
- 25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ngshan Society in Haidai Area: the Germination of Some Factor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Gao Guangren
- 26 Longshan Period: The Age of Early States
Zhang Xuehai
- 27 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from Huang and Huai Area during Prehistoric Times
Lin Liugen
- 29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on the Process of Chiefdom Society: Inspirations from the Polynesian Case
Jiao Tianlong
- 30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Society in Eastern Liaodong Area during the Bronze Age and the Early Iron Age
Ok, Kang Won
- 31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Kangwon, Province of CentralKorea
Hyuk-Jin Ro

- 32 The Origin of the Private Form of Prehistoric Fortune: A Case Study of Liyang Plain,
Westnorthern Hunan
Pei Anping
- 36 The Excavation of the Qingliangsi Cemetery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Song Jianzhon and Xue Xinming
- 37 New Finds of Wangchenggang Site, Dengfeng, Henan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Early Xia
Culture
Fang Yanming
- 38 The Sea Salt Industry and the Society Evolvment of Northern Shandong in the Pre-Qin Period
Wang Qing
- 40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the Rizhao Area: Possible Models for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Anne Underhill
- 41 How Systematic Settlement Pattern Survey Revolutionized the Study of Complex Societ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Gary M. Feinman and Linda M. Nicholas
- 41 The City-oriented Settlement Patterns in Haidai Area
Song Jian
- 42 Settlement Archaeology Research of Yuanqu Basin, Shanxi
Tong Weihua
- 44 Settlement Archaeology Research of the Erlitou Site and the Peripheral Region
Xuhong
- 45 Discussions on the Plant Remain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in the Drought Area of Northern China
Kong Zhaochen
- 46 Discussions on the Plant Remains from the Neolithic Sites in China
Liu Changjiang
- 47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Geology Based on the Small Valley System
Xia Zhengkai
- 48 Holocene Climate Changes and Their Significations to the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Yang Xiaoyan
- 49 The History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Flux of the Orient Coast Line during Prehistoric
Times
Gao Menghe
- 50 The Mixed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Dry and Rice Farming during Late Neolithic Times in
Haidai Area
Zhao Zhijun
- 51 The Ways of Raising Pigs in Sty of Prehistoric Era
Huo Dongfeng
- 52 A Summary of Archaeological Works of Longshan Period in Rizhao Area
Yang Shenfu
- 53 The Techniques of Architecture Walls at Rizhao Area in Longshan Period
Liu Hongjun

1998~2001年 日照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

1998年12月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对日照两城镇遗址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三年来,中美学者密切合作,本着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发展的意愿,求同存异,在龙山文化考古研究和田野考古发掘方法、技术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以下我们分两个方面报告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一、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两城镇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普遍性的勘探、城墙和壕沟的发掘与聚落和墓葬的发掘。

一是勘探工作,包括传统的探铲勘探和地磁仪勘探。前者主要搞清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主要地段文化层的厚度,确认在南北1000米,东西1050米的范围存在文化堆积。文化堆积以现在靠近两城镇的村西和村西北一带保存相对较好,最厚的地段厚度在2米以上,大部分在2米以内。村西北的坡地上次之,由于自然因素的侵蚀和人为破坏,这一带的文化层堆积已不足1米,少数地段几乎全部不存。村中农舍之下保存最差,由于建房整平挖土等原因,现在村内的地面较之30年之前已经下落了1米有余,个别尚未翻建的旧房屋已经高悬在现今地面以上。所以,除了个别挖得较深的遗迹,一般的文化层堆积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二是城墙和壕沟的发掘工作。为了解两城镇遗址的外围是否存在防御性设施及其分布情况,1999年以来,我们每年都组织专项勘探和调查。勘探结果表明,两城镇遗址存在内、中、外三圈围壕,每圈的面积大小不一。2000年冬,首先在遗址北部的中圈围壕之内侧(亦即内圈围壕外半之上部)发现夯土遗存,或认为是城墙遗迹,其上外缘垒砌有比较规则的石块。2002年,在同一圈围壕的另一地段,也发现了城墙夯土。至此,至少是在中圈围壕内侧确认了夯土城墙的存在。因为外圈围壕受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而内圈围壕则基本上被叠压在村舍之下,所以目前尚未发现与这两圈围壕相对应的城墙遗存。

三是聚落遗址的发掘工作。1998年,为了了解两城镇村内所剩无几的原始堆积情况,我们在一户迟姓村民即将翻建房屋的院落内进行了小面积抢救性发掘,这一工作断续进展到1999年冬。经发掘,发现这里保存着较好的两城镇遗址的原始堆积,除了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之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周代和汉代堆积存在。

同时,在勘探过程中,发现遗址西部(村西)较高位置的堆积较有特点。这一带的文化层厚度多在1~1.5米之间,是龙山文化堆积十分丰富的居住区。勘探中发现两大片比较单纯的黄土堆积,当时认为这里有可能是比较大的台基式建筑一类遗存。基于此,我们把主要的发掘地点确定在了这一地段。后来的发掘证明,开始认为的大型台基,其实只是由于人们长时间连续居住而形成的多层叠压的房屋遗存。

发掘区的文化堆积不厚,一般在1.3米左右。据村民介绍,这一带曾因公社化时期大规模的挖土积肥而受到严重破坏,除了个别周汉时期墓葬之外,耕土层之下即为龙山文化中期前段时期的堆积。发掘区的龙山文化遗存至少可以分为连续的六个时间段,时代从龙山文化早期偏晚到龙山文化中期,以龙山文化中期偏早阶段遗存最为丰富。

第一时期,在原始的地表开始建造房子,也有零星的墓葬分布。这一时期的房子之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但并不是同时建筑起来的。从层位关系所反映的时间顺序来看,它形成的

过程是这样。

首先建造的房子是 F39, 房屋坐北朝南, 直接坐落在生土地表之上。在房前东南 5~7 米的位置, 发现 2 座墓葬, 均建于生土之上, 其与房子孰早孰晚及相互关系, 目前尚难定论。

随着房子的使用, 在房外形成了 3 层人为铺垫的活动面, 每层厚约 1~3 厘米, 而房子之后和东西两侧则逐渐形成以灰土为主的堆积。

在灰土堆积之上, 出现了一批房子, 与 F39 密切相关的是 F65, 它位于 F39 的西南, 门道向东, 两座房子共用一个活动场地(即院落), 先后经过了 7 次铺垫而形成 7 层活动面, 加上原来的 3 层, 共有 10 层之多。两座房内的地面和灶也先后经过多次铺垫和新筑, 说明两座房子共同存在了一段时间。

最后, 两座房子同时废弃。

第二时期, F39 和 F65 废弃的同时, 在院落的中部以南, 出现两个大型坑, 深度都在 1 米之上, 灰坑和废弃的房子之上出现可分三个小层的一大层文化堆积。据此分析, 这一时期这里短时间没有房子, 不是直接的居住地。

第三时期, 在第二时期堆积之上又开始建造房子, 分两层, 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小的时期。

下层为两座只有柱洞而未见墙体和基槽的房子, 均为方形, 东(F62)、西(F63)各有一座。

上层为两座地面式房子, 东(F61)、西(F60)分立, 基本上是叠压在下层两座房子的位置上建造起来的, 但略有错位。房内均有灶址, 局部保留墙体。房地面尚保存有一至三小层。

第四时期, 在第三时期上层房子之上, 有较薄的一层垫土, 垫土之上发现两座并排的房子, 保存甚好, 不仅有完好的多层活动地面、灶址, 还有户外活动面和较高的墙体。东侧一座为 F54, 西侧一座为 F59, 与第三时期上层的房子位置不同, 似不属于就地重建。从两座房子内均有 4~5 层连续铺垫的地面和灶址、房外均有若干层活动面看, 其使用时间较长。

第五时期, 在第四时期的 F54、F59 之上, 又发现柱洞式房子, 也是东(F57)、西(F56)各有一座, 位置有错动。西侧的房子之上还叠压另外一座房子(F55), 因破坏, 地面已不存。与此大体同时或略晚, 在整个发掘区还发现一条极长的基槽(F21), 槽内密布小柱洞, 柱洞极深, 有的可达 1 米左右。

第六时期, 位于耕土层下的大批龙山遗迹, 既有灰坑也有墓葬。他们均打破第五个时期的房子。

以上六个时段, 大体勾勒和揭示了两城镇遗址 1999 年~2001 年发掘区龙山文化遗存连续的使用和堆积过程。现在看来, 龙山文化居住区的房子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建造—废弃—再建造—再废弃”的过程。这些层层叠压的房子, 一部分过去曾认为是“台基式”房子, 其所坐落的“台基”很可能就是一座时代更早的房子。当然, 这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分析来加以证实。

二、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探索

考古发掘是田野考古学中最重要的工作。在两城遗址的发掘中, 我们严格按照中国传统的地层学原理进行田野操作, 如按土质土色划分文化层和遗迹、按最小的单位收集和存放遗物、客观准确地做好各种记录, 等等。但在具体作业中, 我们要求尽量把地层和遗迹做得更细致、更准确, 资料收集得更全面、更丰富, 记录内容更精确、更详细。同时, 尽最大可能吸收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两城考古研究, 力求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关于田野考古方法的改进,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发掘方法。在常规发掘方法的基础上, 我们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改进。

1. 布方。由于发掘的要求越来越细, 探方的面积太大不利于对各个部分的细致把握,

所以经过认真的研究后我们把探方由传统的 5×5 米改为 4×4 米, 面积也由 25 平方米变为 16 平方米, 缩小了近 $2/5$, 同时, 把隔梁的宽度减至 0.5 米。探方的编号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 还增加了坐标法, 即以遗址的西南起点为基准, 每一探方增加西南点的北、东坐标, 这个坐标也就是探方位置, 填写时加注在传统的探方号之后。如 E4T1205 (696N, 816E), 它表示这个探方的西南点坐标是从总基点向北 696 米、向东 816 米。在实际操作中, 为了从平面上把握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 要求各个探方在进度上尽可能保持一致, 隔梁也可以视需要而随时打掉 (或部分打掉)。

2. 最小单位的重新界定。以往我们一般是把一个小的文化层, 或一座房基, 或一座灰坑, 或一座墓葬, 作为一个基本的地层单位, 当然, 有时也在其内部分层。为了更细致地了解文化层或遗迹内部的细小变化, 进而分析和把握人类的行为过程, 我们把以往的地层单位分解成更小的单位, 并采用顺序号码的编号方法加以表示和记录, 与所谓 Context 方法类似。例如, 发掘一个灰坑, 要求先清理一半, 清理的堆积至少给一个顺序号, 完毕后, 绘制剖面图, 然后按剖面的实际堆积层次发掘余下的一半, 每一小层给一个顺序号。房址、墓葬等遗迹也是一样。地层则按最小的层次编号, 如果一个层次较厚而土质土色又看不出什么变化, 就自上而下每 10 厘米划为一层, 给予编号。如果在两层之间的地面上发现特殊遗物或采集了样品, 则既不归上也不归下, 而是单独编号按地面的内容予以记录。

3. 对所有的堆积物进行筛选。筛土的方法在国外运用得较为普遍, 而国内使用得不多。筛子的网眼有两种, 分别为四分之一英寸和八分之一英寸。两城发掘是采用了全部过筛的方法, 由于筛土很影响发掘进度, 所以是发掘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但筛土确实能够发现一些我们以前忽视了的东西, 如剥落的小石片、小的动物骨骼等。必要时, 还需要采用水洗的方法, 这样做能发现更多的细小遗物。就目前情况而言, 在国内的发掘中采用全部过筛的方法还有一定困难, 但对一些重点单位 (如灰坑、房地面等) 进行筛选则很有必要。

4. 关于土质土色的描述。以往我们都是按个人的观察和认识来描述文化堆积的土质土色, 因此造成了相互间的种种差别, 很早国内就有学者呼吁在考古发掘中使用色谱, 以统一土色标准, 但一直没有能够实行。在两城考古发掘中, 我们对此进行了尝试。首先是采用统一的色谱通过比对来确定土色, 并注明干湿程度, 同时仍然附上传统方法的描述。其次是从三个方面分析土质状况: 分选情况, 大体分为粗、中、细三类, 每类之下又分为好、中、不好三个级别; 土质构成, 按土壤学中的三大类土壤进行比对描述, 即粘土、淤土和沙, 并采取许多中间类型; 包含杂物情况, 如砂粒、红烧土颗粒、草木灰和炭屑等。

(二) 记录方法。考古记录仍采用传统的文字、图纸和影像三种基本方法, 但应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加以改进、补充和完善。

1. 文字记录改为表格记录为主的方法。以往的文字记录也包括表格, 但相对较为简单。为此, 我们专门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表格, 如房址记录表、墓葬记录表、地层和其他遗迹记录表、各种测试样品登记表等。表格记录法的优势在于既面面俱到又简明扼要, 记录以顺序号为单位, 每一地层或遗迹又有总的记录, 可以相互参照。表格要求在现场完成, 或在现场记录有关内容, 晚上回到驻地填表。

2. 图纸记录的要求更加细致, 主要变动有如下六个方面: (1) 在发掘之前测量一张较为精确的地形图, 等高线为 0.5 米, 并直接采用海拔高程表示; (2) 记录系统的坐标均以遗址的西南总基点为起点, 而不是原来各自探方的西南点, 这样做就使得所有遗存在遗址中的位置一目了然, 不需要再进行换算; (3) 用全站仪进行定点和测量, 所有基线的两个端点和所有出土遗物的中心点, 均采用全站仪定点, 即距遗址西南角总基点的纵横坐标和海拔高度, 全站仪定点的理论误差在 0.01 厘米, 而实际操作误差一般在 1~2 厘米之内; (4) 为了更好的表现考古遗存的细部特征, 把图纸的比例统一规定为 1:20, 个别特殊的遗存可视需要进一步扩大比例; (5) 除了手工作图之外, 对所有遗迹 (包括部分地层) 和出土小件遗物, 用全

站仪单独测量一套图纸资料，直接存入微机，可以变换视角进行观察；（6）用全站仪测量发掘区的微观地貌，等高线一般为 20 厘米。

影像记录仍以传统的拍照和摄像为主，只是增加了数码相机等新的设备，这在国内的考古工地上已经逐渐普及。根据照片的保存情况，拍照以彩色幻灯片为主，配以少量黑白片，而基本上不用一般的彩色片。增加拍照的数量，做到所有的遗迹和出土物均有记录。

（三）资料的收集。收集各种遗物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一环，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广泛运用，田野发掘所收集的资料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在两城考古发掘中，除了上述对全部堆积物过筛以收集所有人工制品和动植物遗存之外，将资料的收集范围加以扩大，并使其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收集所有人工及自然的石块和石片。在以往的发掘中，一般只是收集属于人工制品的石器。随着研究的深入，发掘中我们不仅收集各种成品和半成品的石器，而且特别重视对制作石器时剥落的石片的收集，因为它对石器制作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还收集堆积中所有的自然石块，除观察其是否有人工痕迹外，还可鉴定其岩性并称重，分析石器原料的来源及比例关系等。

浮选样品的采集。为了加强古代经济活动的研究，并使分析统计结果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我们在所有的编号单位中随机采集 5 升或 10 升土样，个别特殊的单位如房内地面、炉灶等则全部取样，通过水洗选别法进行浮选。这一工作的系统开展，使我们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新资料，如各种炭化植物、细小的动物骨骼和极小的石片等，这些遗物采用一般的发掘方法很难发现。

各种测试土样的采集。除了浮选外，我们还在所有的编号单位中采集一定量的土样，用来做各种检测分析。如植物硅酸体分析、孢粉分析和土壤微形态分析等。孢粉分析已为大家所熟知，而植物硅酸体和土壤微形态分析近年来正在兴起。特别是植物硅酸体分析，对于古代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古代环境的复原和变迁等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要收集各种可以进行测年的标本，如各种炭化植物标本等。对一些可能有特殊用途或特殊意义的器物，采取仔细起取和密封保护的方法予以处理，以备室内进一步分析研究。如对可能是酒器的容器，就要连土一同起取；一些刃部保存较完整的工具，不但起取后要立即密封保存，而且刃部周围的土样也要采集，以便进行植物硅酸体等分析时加以比较，为确定工具的用途和功能提供证据。

（四）多学科综合研究。在考古学中提倡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的介入，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越来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在两城考古发掘中，我们在设计研究课题时就制订了详细的多学科研究计划，尽可能多地吸收国内外各学科的专业人员参加研究，以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和资料，丰富两城考古研究的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和十几个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包括地磁仪法探测地下堆积和遗迹分布情况、土壤微形态分析、炭化植物的鉴定和研究、植物硅酸体分析、孢粉分析、陶器（陶片）的成分分析、陶器制作技术分析、酒器的化学分析、人骨碳十三食谱分析、石器岩性鉴定、石器的统计分析和模拟实验、碳十四和热释光法测年等，其中许多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些研究将持续进行下去。为了使各学科研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我们把绝大多数参加研究的学者请到了两城考古工地，使他们能够部分地参预发掘工作。例如：为了进行古代植物的分析研究，我们把长期从事植物考古研究的专家请到工地，亲自给考古队全体人员讲授植物考古研究的方法、基本内容和现状，并示范如何收集浮选土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时，请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在工地现场给全体人员讲解，使参加考古发掘的人员能够基本掌握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进而做到自觉和准确地采集样品。

山东日照两城龙山文化遗址围城遗迹的发现与发掘

于海广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及研究中，日照两城遗址是一处发现及初次发掘时间都比较早的地点，此后又经过多次调查，该遗址以文化堆积厚、出土遗物丰富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自 1995 年以来，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和美国考古学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以两城遗址为中心，进行了连续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部分工作成果已经陆续发表，从而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我仅就尚未报导的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的工作情况作以简要的介绍，供各位专家参考。

一、日照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田野实践的初步成果

围绕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的钻探和发掘先后经过五个年度，累计 10 个月的时间，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先后探明了大、中、小三道环壕，对各圈壕沟的形状、结构和各部位的面积提供了科学依据，可以确认两城龙山文化遗址的范围主要分布在大环壕之内。

第二，发现局部壕沟内侧有墙基遗迹，并可以判定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以环壕为主。

第三，经钻探可以确定的有三个出入口，另外几处线索有待进一步确认。

第四，配合钻探成果，先后选择 16 个地点，以探沟形式进行了解剖发掘，发掘面积近 700 平方米。

第五，清理出土了一大批遗物，其中可复原的陶器千余件，石器、骨器等数百件，丰富了对两城龙山文化面貌、特征的认识，收取了一批测年和鉴定标本。

二、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田野实践的意义

随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位于中国东部地区的龙山文化研究也更为人们所关注，久负盛名的日照两城龙山文化遗址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也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内容。而围城遗迹的探寻和确认，对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通过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的发现，对确定该遗址的面积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二十世纪 50~70 年代，老一辈考古学家刘敦愿先生等考古学家对两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大体划定了遗址保护范围，具有重要意义。但仅就地面踏探所划的遗址范围，从今天的要求来说尚难以取得共识，就中美联合考古队内部经实地调查就有不同的范围认定，而且分歧较大。通过对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的钻探和发掘，对遗址范围方面取得了可靠的 firsthand 资料。

第二，围城遗迹的发现对确立两城文化龙山文化的性质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城龙山文化遗址在日照地区龙山文化群中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单依据过去调查所知其范围大、堆积厚、内涵丰富是不够的，例如两城附近的丹土遗址不仅有龙山文化的城址，而且在大汶口时期已经初具规模，范围远大于丹土的两城龙山文化遗址是否是城址？它与丹土及其他临近地点的龙山文化遗址的关系如何？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的发现，对定位它在龙山时代的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宏观研究东部地区聚落群的关系将显示出其突出的地位和意义。

第三，对深入认识两城龙山文化的面貌、特征有重要意义

过去对两城龙山文化面貌特征的认识，有 1936 年发掘的墓葬资料，这固然重要，但有一

定的局限性。至于采集到的实物，缺乏地层依据，所以说对两城龙山文化面貌、特征的研究，在此之前难以系统梳理。在这次围城遗迹的探寻中，我们先后发掘了十几条解剖沟，取得了大批出土物，对分析两城龙山文化的文化特征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对两城龙山文化围城遗迹的钻探和发掘，虽然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钻探、发掘资料所提示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因钻探力量薄弱，先后只有3~4人承担这项工作，加之工作时间所限，钻探时探孔距离过大，有可能漏掉某些迹象，需要做些补探和复探。

第二，自1999年~2002年的工作期间，正是该地区降雨偏多的年份，对钻探和发掘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使工作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三，围城遗迹很大一部分是现在的居民区，这使解剖沟无法合理安排。

第四，由于上述原因，至今尚未发现位于小环壕的出入口，中环壕和大环壕的出入口也显不足。

（上接第13页）

大孤堆与瓦屋村的发掘都采用了史语所早期发掘使用的长探沟，沿地形做南北、东西方向排列。瓦屋村的主要发现为43座龙山时期的墓葬，其中13座有随葬陶器。另外发现了可能为建筑遗存的烧土面与柱洞（桩窝）。出土的器物包括陶器与石器。大孤堆仅发现6、7个墓葬，其中M2出土了一件质地较好的玉钺。其它的主要发现为数个“陶器堆”，可能属于房子内部的堆积，有不少可以复原的陶器；出土器物也有不少石器。由于两城镇发掘采用了长探沟，我们根据发掘记录与出土实物，无法清楚掌握瓦屋村与大孤堆遗迹的面貌。

两城镇的发掘报告在1930年代即已着手进行。刘耀瓦屋村的报告当时大致完成，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刘耀决定以家国为先，放下了即将完成的工作。他在报告手稿的最后做了如下的注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眼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

刘耀在手稿中提及祁延需在他之先，已大致完成大孤堆的发掘报告。目前史语所保存的大孤堆手稿，完成程度尚不及瓦屋村。史语所多次辗转，两城镇报告的出版工作因而搁置，一直到近年才得以继续进行。张光直先生返台任中研院副院长时，曾主持整理工作，并邀请了社科院考古所高广仁先生赴台湾检视这批材料。而后本所黄铭崇继续进行了手稿的各项整理工作，并至南京博物院重新拍摄史语所留置的两城镇陶器。目前后续的工作由我担任，在本所同仁的协助之下，希望能及早将两城镇报告出版。同时进行的工作尚包括王湘、祁延需的山东省日照县考古调查记，以及史语所山东考古工作的往来书信。这部分将以史语所资料丛刊的形式出版。

1995~2004 年日照地区系统考古调查的新收获

方辉 栾丰实 于海广 蔡凤书（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Anne P. Underhill, Gary M. Feinman, Linda M. Nichola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Field Museum, Chicago, Illinois)

1995 年至 2004 年日照地区长达 10 个季度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迄今覆盖面积 947.7 平方公里，揭示了上自北辛文化、下至汉代时期聚落形态的历时变迁，也为分析特定文化阶段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调查资料显示，聚落出现明显的分层是在公元前 2600~2400 年的龙山文化早期，形成了两城镇和尧王城两处区域中心，这种情况延续到龙山中期。进入早期青铜时代，本地的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应该反映了地区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这一演变过程，代表了与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同的发展模式。

一、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晚期

调查区域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遗址属于北辛文化，共发现两处遗址，均地处调查区域的南部，位于奎山西侧山脚下，面积较小，不足 10000 平方米。已知的北辛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和苏北地区，但在日照地区还是首次发现。

北辛文化遗址是迄今所知日照境内最早的人类遗存。尽管近年来有关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制石器的报道，但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遗址。我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沿海地区广泛分布的沼泽洼地似乎不适于密度较大的人口生存。

相比而言，属于大汶口晚期的遗址数量有所增加，达到 24 处，但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属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阶段的遗址。遗址的面积最大者为 5.8 公顷，其他均小于此数。遗址在平原、山麓和山麓向平原过渡地带均有分布。面积最大的遗址分布在尧王城遗址的西部，与其他四处地点共同组成一个分散的社区。与之相似，东海峪遗址上的大汶口晚期遗存是由三处分散的地点所组成，而冯家沟遗址（DG-FJG-2）则有两处面积较小的地点（均小于 3.8 公顷）组成。东海峪遗址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经过正式发掘，其遗存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

仅仅凭借调查资料，我们还很难说大汶口晚期日照地区已经出现层级的聚落形态。不过，根据 2001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丹土遗址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则可初步断定聚落分层的情况是存在的。这次发掘证实，丹土遗址大汶口晚期的堆积超过 9.5 公顷，而且发现了城址。

山东境内其它地区的材料有助于说明大汶口晚期的社会性质。在鲁西南地区的考古调查，揭示出了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的聚落形态。在西距日照市约 60 公里莒县沭河流域，大汶口晚期的墓葬存在着明显的贫富差距，显示了社会分层的事实。

我们推测，具有规模性的首批移民进入日照地区大约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这里是沿海地区，地势较低，西部有五莲山脉阻隔，在自然地理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一地区南北各有通道与外界相连，古人很可能是沿着这条南北通道进入该地的。这条通道从史前直至历史时期都是贯通的。我们计划继续对尧王城周围区域展开调查，以确定最早的分层级的聚落形态是否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连接该地区与西部莒县县境的通道是付疃河，尧王城遗址位于主河道的西南约 8 公里处。自大汶口晚期开始的人口持续迁入，可能是由西部地区日益激化的社会竞争所促成。尽管看起来迁入此地的人们最初可能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社会阶层，但为了适应新的地区的生活，他们逐渐发展出一套自身的社会政治体系。

二、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聚落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加,达到425处。这应该是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

半数以上的龙山文化遗址可以进一步划分出期段,最为剧烈的变化发生在龙山早期(2600~2400 B.C.),遗址数量达到了139处。平原、山麓和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都有遗址的分布。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处大型区域中心聚落,一处是位于北部的两城镇聚落,另一处是地处南部的尧王城聚落。前者是龙山文化早期迅速膨胀形成的,后者则是在大汶口晚期基础之上稳定发展的结果。尧王城聚落根据地表陶片分布测得的面积为367.6公顷,较之两城镇聚落的246.8公顷还要大。尧王城遗址采集到的陶片达2000余片,石器有15件之多。

早在1936年,两城镇遗址的重要性就因精美玉器和黑陶的出土而受到广泛重视。后来的调查和试掘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关于尧王城,早期的报告推测其面积约在52公顷,而且也有精美黑陶和玉器的出土。后来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的房址和稻米。

属于龙山文化中期(约2400~2200 B.C.)的遗址发现120处,分布于平原、山麓以及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其中,74处遗址只包含了单一时期的堆积。尧王城与其他56处遗址则包含了龙山早、中期两个阶段的遗存,而包含有早、中、晚三个阶段遗存的遗址只有两城镇一处。

龙山中期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两城镇聚落面积的扩大,无论是地表采集还是考古发掘都证实了这一点。聚落的核心区域,即居住密集区,据发掘和钻探得知,面积也在100公顷左右。伴随着两城镇核心聚落的扩大和周围龙山早期遗址的废弃,该地形成了区域意义上的城市。

以遗址的大小面积来判断,龙山时代聚落等级可以分作四个层级。我们认为,其行政管理职能可能存在于前三个层级之中。当然,要证实国家组织的存在,需要由将来发掘所提供的足够证据予以证实。无论是第一层级的中心,还是第二和第三层级的其他25个次一级中心,都包含了龙山早、中期两个阶段的遗存。第一层级的聚落,只有两城镇一处延续到龙山晚期,当时与其并存的5处次一级中心和2处村落也都位于调查区域的北半部。

两处主要区域中心都位于平原地带,大部分二级中心则位于平原或过渡地带,只有DG-DWJC-1一处例外,三级中心聚落在三种不同地形区都有分布。多达34.8%属于第四层级的小型遗址分布于山麓地带,其中9处遗址存在于海拔80米以上的高地,且贯穿了龙山文化的早、中期。这些分布于山麓地带的遗址多数靠近调查区域的边界线,位于调查区域的最西端。其中,4处遗址集中在西北部的五莲县境内,只有3处位于调查区域的南部。在这个高度的区域内没有发现大汶口晚期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存在,应该具有军事防御和山林资源开发的双重功能。

龙山时代早期和晚期,尧王城和两城镇可能是两处分离的、互不统属的区域政治中心。在两城镇和尧王城两个聚落群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遗址空白区,很可能代表着两个政体之间的缓冲区,而这一地带恰是两个盆地的分水岭,也是地理上的自然分界。类似的存在于不同政体之间的“缓冲区”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例如墨西哥奥哈卡谷地。此外,两城镇和尧王城都存在着四级的聚落形态,而且都出现于龙山时代早期阶段,只是尧王城先于两城镇而衰落。值得注意的是两城镇与尧王城两个区域中心性聚落的距离。美国学者Hally曾引证北美地区历史时期的证据,论证密西西比史前酋邦从中心到边界的半径距离为20公里。这一点与两城镇和尧王城的例子有些类似。我们计划对尧王城以南区域继续进行调查,搞清其聚落形态及所属领域,以有助于判断其社会性质。

迄今所揭示的两城镇和尧王城各自的聚落形态显示了两地权贵阶层不同的掌控方略。主要中心和次一级中心的空间关系可以反映区域内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要内容。龙山早期围绕着两城镇所发生的聚落核心化过程就非常引人注目。龙山中期,除了中心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之外,两城镇外围聚落的核心性更加明显了,第三层级聚落的面积也呈现出快速增加的现象。据此我们认为,龙山中期两城镇政体在规模和实力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对于两城镇及其周围聚落的核心化趋势,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权贵阶层为了控制人力和物质流动(包括原材料和产品)所采取的策略。主要中心靠近次一级中心,有利于提高人口与物质的流动效率。直到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统治者还把劳力与生产生活资料的控制作为重要的统治策略。甲骨文显示,对于农业和各类手工业劳力的控制,是商王朝始终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也存在类似情况。

属于第二层级的丹土(DG-DT-1)和两城镇-2/3(DG-LCZ-2/3)与两城镇聚落相距不到2公里。这种在主要中心周围形成次一级中心的聚落群,相互之间应该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丹土遗址在龙山早期成为二级聚落中心,龙山中期保持了这一地位。早年该遗址也曾出土过龙山时代的精美玉器。

两个主要区域中心可能都为了开垦耕地和建筑房屋组织起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近年来在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发现该遗址有高台式房址、聚落环壕和东部的一段城墙。植硅体研究揭示出较多的水生植物的存在。浮选发现,小米之外,稻米是人们主要的农作物之一。这就要求对水源的控制,并需要有水田管理。水利系统在尧王城遗址也应该存在。直到今天,稻作水田在靠近南部的这一地区更为普遍。水源控制和水田管理部分地可以由血缘的家庭组织合作完成,但为了满足本地区快速增长的人口住房和食物供应,显然需要对劳动力进行合理组织和安排。

两城镇遗址外围,尤其是南北两地二级中心聚落近乎等距离有规律的分布,无疑有利于物质的流通。与尧王城所在区域相比,两城镇聚落的权贵们拥有更多的二级聚落。其东北部有两处二级聚落,与两城镇相距分别为7公里(JN-JWD-2, LHQ-1)和16公里(JN-XS-1)。此外,处于“缓冲区”以南山麓地带、与两城镇相距约10公里的另一处二级聚落DG-DWJC-1,可能有时也会向两城镇聚落承担纳贡的义务。

两城镇还拥有一些分布于山麓和平原地带的三级聚落,尤其是在北部。二级聚落与三级聚落的间距呈现出连锁式等距格局。许多次一级中心显然控制着多个更低层次的遗址。区域内有两处二级聚落似乎是为了控制某些三级聚落而有意设置的。

与之相比较,尧王城周围的聚落形态则相对分散。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像在两城镇北部发现的由大小遗址组成的聚落群和低层次上的聚落分级现象。与尧王城最近的两处二级聚落(LS-JG 3/4, DG-DXQH-1; DG-DHY-1),距离都在8公里以上。看来,尧王城的权贵阶层对于本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来自外围聚落的人力和物质供应可能并非经常性的,而尧王城及其周围所具有的功能也可能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继续其南部区域的调查,以确定其可能存在的次一级聚落中心。

调查区域内河流众多,它们无疑是古人交通和运送物质的最佳通道。两城镇遗址靠近一条主河道,而尧王城则位于一条支流上。7处二级中心中有4处靠近主河道或支流,这些河流成为运输人力物质的水道。其中,LS-JG-3/4, DXQH-1中心靠近主河道,其他3处二级中心,即JN-XS-1, DG-DWJC-1, DG-LCZ-2/3,则紧邻支流上。三级聚落中有6处靠近主河道或支流。

我们曾根据前5年的调查资料,揭示出北部地区的聚落形态呈明显的聚落群状分布的特点。这些聚落群大小不同,但都是以一处二级或三级聚落为主形成两层或三层的“小分层”。最东北部的JN-XS-1连接着三个三级中心,其间的距离在5.5公里的范围内;JN-JWD-2, LHQ-1则连接着6个三级中心,距离均在7公里范围内。而这些三级中心则控制着周围众多的四级聚落。两处二级中心(DG-DT-1和DG-LCZ-2/3)周围也呈现出相似的聚落形态。在靠近尧王城的南半部,二级中心(LS-JG 3/4, DXQH-1)周围则未发现清晰的“小分层”现象。另外两处二级中心,即DG-DWJC-1和DG-DHY-1,与其他三级聚落相距较远,未形成依附关系。

这些较小的聚落群贯穿于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反映了地区中心外围地区相对稳定的权力延续。对于两城镇和尧王城这两个地区中心来说，这种稳定的组织结构无疑有利于它们获得稳定的劳力和物质资源的供应。对于两城镇来说，因为聚落经过了优化整合和配置，情况尤其如此。日照地区所存在的这种结构优化的区域组织，可能反映了国家的存在，尽管这里缺少典型的围绕一个中心而存在的六角晶格模式。我们计划对不同聚落群的遗址进行解剖，以搞清聚落及聚落群内部的关系。由遗址群所组成的某些小区通常由自然地理标志（如山脊等）加以界定。

同时，南半部那些相对分散的聚落群对于主要中心来说缺少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整合，它们可能代表了低一级层次上的行政单位，但与两城镇所属的聚落群相比，应当具有更强的自治权利。一方面，居住在这些次一级中心上的权贵阶层有时需要向主要中心供应物质，或在需要时共同御敌；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为了自身聚落群的利益而独立行事。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早期复杂社会的政体经过高度整合。但在我们所工作的鲁东南地区，主要中心及其外围次一级中心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不总是稳定的。

陶器的分布可以为探讨主要中心权贵阶层与第二、三级权贵阶层之间的互动提供有用的信息。例如，在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区，生活于中心聚落上的人们使用的器物种类复杂多样。同样，我们的调查区域内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两城镇和尧王城两个主要中心陶器器类多达18~24种，其中包括那些搞劳动含量的贵族用品，如蛋壳陶高柄杯等。陶器种类的多样性在两个遗址以往的发掘资料中也有体现。而属于第二等级的遗址中器物种类也较多，达到了8~15种。

平均说来，层级较低的遗址上陶器种类的多样化程度较低。8处属于三级的遗址采集到8~11种器物种类，占遗址总数的44.4%。而具有同样器物种类、在属于第四级的遗址中只有9处，占有四级遗址数量的2%。而且，泥质磨光黑陶并非第一、二级聚落所独有，几个小型遗址上也有发现。这些出土泥质磨光黑陶的小遗址大都分布在以两城镇为中心的北半部，尤其是东北和西北部。在南半部，这类遗址都分布在靠近西部的区域。

据我们初步研究（包括与当地陶匠进行调查），烧制黑陶需用特殊的陶土并非随处可得，而这种陶土在两城镇遗址附近就有分布。可以推测，那些在两城镇外围聚落上发现的泥质磨光黑陶，可能是作为礼品从两城镇聚落的权贵们手中获得的。作为回报，两城镇的权贵阶层从对方手中得到的是稀有物品、劳动力乃至战争中的效忠。为了维持和加强其政治网络，我们推测龙山时期的权贵阶层采取这种政治策略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是关于两城镇聚落是否曾经作为贵族产品的生产地问题。如果可行，这一研究也可以推广到尧王城所在区域。

聚落的成群分布，应该是彼此之间互补与协作关系增强的反映。聚落的核心化与城市的出现，能够促进家族间的分工协作。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行业世家应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早期的文献记载清楚地显示出这种世家存在于青铜时代的不同时期。当时的军队也是以族为单位的。

两城镇和尧王城作为两个主要区域中心，对其外围社区、尤其是临近社区应该负有义务和责任。居住在这两个区域中心的权贵们可能借助其祖先的威望，以及对其下属领地提供精神和实际保护的承诺，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围绕华北地区其它龙山时代区域中心类似的争论由来已久。看来，两城镇和尧王城就是所在地区的宗教礼仪中心。两城镇遗址发掘中出土了许多反映了宴饮活动的大型陶器，也检测到米酒的存在。在稍后的历史时期，不少证据证明，宴饮活动是统治者为了维持与其他权贵集团和公众的关系所采取的重要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周边村镇所提供的劳动力资源。

近来的研究表明，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期商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高度整合的广域国家，包括像石器在内的手工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以及铜料和食盐等资源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这说

明当时统治者的统治策略重在实用产品的远途控制和分配。由两城镇及其周围遗址所反映出来的聚落核心化现象，似乎说明龙山时代当地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策略。上面所揭示的核心化的聚落形态，是统治者为了更有力地控制诸如食物和人力等重要资源而刻意规划的结果。为了保证核心区域的食物供应，权贵们会加强农业的管理。如果是在国家社会，就会有对食物等经济资源的控制。而对手工业生产进行稳固的控制，通常是在国家形成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

有的研究者在研究我们最初的调查结果时，将面积庞大的两城镇遗址与周围其它遗址进行对比，认为两城镇所在区域经过了高度整合。他们认为，作为占有支配地位的两城镇聚落，反映了暂时的地区稳定和整合，而不像国家形成之前多头政体互相竞争的场面。我们则认为，要对日照地区龙山时代经济整合的程度做出评估，需要从多个方面对调查成果加以解释，并需要考虑到空间规模。对于我们的工作区域而言，空间规模因素尤其重要。例如，龙山时代居住在两城镇的权贵们对于北部地区那些由地方贵族所统辖的次一级聚落群的控制力度恐怕不会太强。有些聚落群本身内部显然经过紧密的整合，而聚落群之间的联系看起来是比较松散的。不过，总体而言，两城镇所在的整个北部地区较之尧王城所在的南半部地区有着较高的整合度。另外，南、北两个区域之间的整合度看起来也是颇低的。

讨论区域间的整合，自然离不开对两个主要区域中心——两城镇和尧王城——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其他地区的研究表明，此类问题的研究比以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你所研究的这些区域中心只是部分地共时时。为了对不同区域中心之间的关系——竞争或协作——进行充分研究，区域性聚落层次的材料是不可或缺的。建立在全覆盖式调查基础上、涵盖了两处区域中心的聚落资料，有望对此问题做出回答。

我们认为，从社会结构上来说，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时代的区域组织的复杂性，比人们所认为的更为复杂：两个同时并存的区域中心，三级的行政组织，代表着小型聚落分层的分散的遗址群。这种不同寻常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可以是一个国家组织，但更可能是两个互相竞争并有联合的国家政体，尽管要证实这个带有挑战性的假说还需要从将来的调查和发掘中寻找足够的证据。至于为什么尧王城聚落与两城镇相比其核心化程度较低，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随着调查区域的向南延伸，也许会发现更多的次一级聚落中心。若然，上述问题本身就不存在了。

三、龙山中期之后的衰落与历史时期的聚落形态

调查中发现的龙山晚期遗存颇为稀少。发现龙山晚期遗存的遗址共有 8 处，其中 7 处分布在北半部，另外 1 处恰巧分布在自然地理边界的南侧。与此相应，迄今发现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岳石文化遗址数量也很少。

岳石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和二里岗期商文化时代相当。迄今所知，岳石文化遗址规模一般较小，陶器以一种粗胎夹砂陶为主，有少量青铜工具和兵器。尽管有证据表明二里头国家势力向西、向北有较大扩展，但似乎没有对东方地区产生太大影响。

有岳石文化陶片分布的地点在调查区域内都有发现，共 16 个地点，大概代表了 14 处遗址。除了位于最东北部的 JN-XS-1 面积达到 9.2 公顷之外，其它遗址的面积都不足 2.5 公顷。如果我们将本地区岳石文化聚落判断为两个管理层级，那么其分布过于稀疏分散的聚落形态特征，反映了其社会组织规模很小，组织也很松散。

山东东部地区商代文化的面貌至今尚不明朗。历史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证明，郑州二里岗和安阳殷墟代表了商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二里岗上层时期商人在山东西部建立起了以济南大辛庄为中心的统治区。从最近发掘出土的甲骨文等遗物来看，直到商代晚期，这里都是典型商文化的分布区域。典型晚商文化遗址的分布向东直到淮河一线，青州苏埠屯遗址是另外一处统治中心。但对于远在鲁东南沿海的日照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商人染指的明确证据。

调查中我们共在 26 个地点发现与晚商文化或珍珠门文化相似的陶片，其文化面貌至今仍

不明朗。因为所有遗址的面积都不足 3 公顷，并缺少反映身份等级的青铜礼器，因此看不出聚落分层的任何迹象。

从海岱其他地区所归纳和总结出来的龙山晚期、岳石和商代陶器组合和演变序列可能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日照地区。换句话说，因为照搬其他地区的陶器序列，存在于日照地区的上述阶段的遗址可能并没有全部被识别出来。另外一个可能是，日照地区的陶器序列与其他地区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现象。如果这一推测可以成立，那么龙山各期的年代就应推后。比如，龙山中期的年代可能会延迟到公元前 1900 年前后。相应地，龙山晚期的年代下限在公元前 1700 年前后，已经进入到其他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的年代范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发现的岳石文化的存续年代要晚于其他地区，可能在公元前 1700~前 1400 年之间，商代文化的时代则可能在公元前 1400~前 1000 年前后。这一问题的解决，当然要依靠对相关遗址进行发掘，并获取相关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抛开年代问题不谈，当地人口规模在龙山时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急剧下降，直到西周时期才得以恢复。从遗址的位置看，只有一处商代遗址位于调查区域西部海拔 80 米以上的高地，对敌防御色彩似乎并非主要的考虑。到了西周时期，分布在高地上的遗址数量明显地增加了。

西周时期，本地聚落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尧王城与两城镇两个遗址的面积较之商代有所扩大，但与龙山时代相比却都有一定程度的缩小。相当数量的遗址分布于山区，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

总的说来，西周与东周时期的聚落形态与龙山时代有些相似，整个区域显示出组织结构上的紧密性。第一个五年期间所作的调查资料显示，周代的聚落形态呈三个层级。第二个五年期间，新发现了数百处周代遗址。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辨识出西周和东周时期的聚落呈四级分布。值得注意的是，与龙山时代相比，新出现了大量第三层级的聚落。

在调查区域的南半部，西周时期新出现了三处第二层级的聚落。另有四处二级聚落是龙山时代就已存在的。其中，有两处二级聚落分布于山地（DG-QZC-1/WLZ-2, DG-XJC-1），一处位于冲击平原（DG-MJC-1）。第三层级的聚落则分处于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前期相比，更多的三级聚落位于海边，显示出对海洋资源开发程度的增强。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位于高海拔地区遗址数量的增加。这类遗址大多沿西部边缘的山脊分布，其功能应该与山地资源开发有关。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考虑，它们可能还具有防御功能。

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显示出秦汉帝国统治对于东方沿海地区实行着强有力的统治。调查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址达到 1192 处，分布于各种不同的地形。聚落形态也显示出了集权制中央政权的存在。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显示出以四处主要聚落为中心，遗址呈四个层级的分布。位于尧王城与两城镇之间的海曲故城突然出现，并成为本地区最大的聚落。这一时期分布于各类地形的 11 处第二层级的聚落中心，表明了控制程度的进一步加强。第三层级聚落由先前的 35 处减少为 21 处，显示了地方自治力的下降。组织形式变化的另一个信号是 9 处新的三级聚落的出现。

四个主要中心聚落之间的距离大致相若，南北两部分两两之间大约相距 10 公里的距离。此外，海曲故城与两城镇之间大约为 20 公里的距离。这一时期在地表上首次见到显示国家权力的建筑物——城墙与土丘墓。

二级中心分布均匀，控制着包括沿海地区在内的一定的区域。经过严格规划的第一和第二等级聚落的分布形态，显示了汉王朝对该地区资源的有效控制。

19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发掘与调查工作

李永迪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虽以发掘安阳著称，但创所的前辈学者对于中国考古的发展与研究方向有其通盘的考虑，同时也注意到早于殷墟的考古学文化。1929年，吴金鼎在龙山镇发现不同于仰韶、殷墟小屯灰陶的黑陶，而后有1930、1931年城子崖的两次发掘。1931年梁思永安阳后岗三迭层的发现，确切地建立了仰韶、龙山、殷商文化的早晚关系。这些使得史语所的考古学家格外重视对于龙山「黑陶」文化的研究。事实上，除了河南安阳殷墟的工作以外，山东是另一个史语所集中进行发掘与调查工作的地点。

史语所在山东的工作除了城子崖以外，大部分都因种种原因尚未能发表。这些工作包括了吴金鼎1930~1933年在山东中部泰峰山进行的多次调查，当时发现了二十多个遗址，有三个属于龙山文化：临淄、城子崖和滕县的凤凰台（《三年间山东古迹之调查总报告》），史语所随后即在城子崖及滕县安上村进行了发掘。1934年春王湘、祁延霈在山东沿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山东日照县考古调查记》、《鲁东调查》），发现的遗址以两城镇所含之遗物最多，遗址的范围最大，复原的陶器最多。城子崖发掘以后，山东古迹研究会计划继续进行发掘工作，因此在1936年夏选择了两城镇，由梁思永带领刘耀（尹达）及祁延霈，分别在瓦屋村及大孤堆进行了发掘（《两城镇—山东日照县两城镇之龙山文化遗址》）。

目前保留在史语所、有关山东龙山文化考古调查发掘的手稿，以王湘、祁延霈的鲁东沿海调查，以及刘耀两城镇瓦屋村的发掘报告较为完整，另有滕县安上村与两城镇发掘时的书信往来。刘耀在其有关新石器的著作中对两城镇的发现曾有所叙述，而史语所留置南京的两城镇出土陶器，早年已经出版图录，是以学界对两城镇的发掘较为熟悉。王湘、祁延霈的调查则仅在刘耀《新石器时代》中略微提及。

王湘、祁延霈是在滕县发掘之后，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的指示，于1934年由济南前往日照、即墨、诸城等县调查。当时的主要目的在寻找彩陶与黑陶的分布范围，另因为日本学者驹井和受已经发表了黄县龙口的贝冢，史语所山东沿海调查也把寻找贝冢（蚌介堆）做为一个重点。王湘、祁延霈于当年四月开始，自即墨、日照沿山东沿海展开调查，至五月下旬沿海岸北行，往胶县、诸城县，于五月廿三日由青岛返济南。五月中旬，祁延霈因事赴河南，其后的调查是由王湘一人进行。调查经历的时间共两个月又两天，一共发现十余处遗址，包括即墨城子村、大洼、两城镇、丹土村、台庄、小挪庄、林子头、臭杞园、尧王城、秦官庄、刘家楼、安家岭、琅琊台。除即墨、琅琊台、秦官庄、臭杞园外，其余均发现了龙山文化陶片。这九个发现龙山陶片的遗址，除丹土村属诸城县，其它均在当时日照县境内。王湘、祁延霈的报告中已具体认识到「日照的黑陶，不但与河南不同，就是与龙山镇的黑陶也有些差别」。这次的调查没有发现彩陶或贝冢。

两城镇的发掘是在山东古迹研究会名义下的第四次发掘。参加人员除史语所人员外，还有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沈维钧。经过现地勘查后，当时决定依照着遗址的地形分两处发掘，一为靠紧镇西的瓦屋村北，由刘耀负责，一为离镇西约一里多的大孤堆东边，由祁延霈负责。其后的发掘报告也由两人分开撰写。梁思永在发掘初期，分别指导两地的发掘工作。根据保存的往来书信，两城镇发掘是由安阳的技工训练当地民工，因为民工均属生手，发掘初期工作进行较不顺利，直到发现了龙山的墓葬及大量的陶器，刘、祁二人方为之振奋。

(下转第5页)

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木材分析

靳桂云 于海广 栾丰实 王春燕（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Anne Underhill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Field Museum, Chicago, Illinois)

当今学术界，对于史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在 19 世纪之前，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气候变化或者环境灾难影响了古代文明的发展乃至消亡，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很微弱。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由于森林砍伐和农业活动的广泛开展，在大约 8000 年前，就开始了“人类温室的时代”，在前工业时代确实已经出现了CO₂浓度增加的现象。

中国是研究古代环境与人类关系的关键地区之一，因为早在 1 万年前后，很多地区都已经开始了农业活动。早期人类活动对森林等植被有重要影响吗？逻辑上讲，肯定是有的。但是，要为这个问题提供科学答案并提供证据，就必须具体研究植被变化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这是考古学家和古植被学家必须共同努力完成的任务。

已有的研究结果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通过分析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各类植物遗存，是考古学与植物学结合，探讨人类对环境适应与影响的有效手段。根据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木头（包括浸水的木头和干燥的木炭，下同）样品的树种鉴定结果，分析史前人类利用植物活动并复原聚落周围的植被，已经成为现代考古学研究人类与植被关系的重要内容。

中美合作“日照考古学研究项目”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进行综合的植物考古研究、认识人类与植被关系的科学目标。在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工作中，我们采集了大量的木头样品，其中有浸水木头（发现的数量很多，但考虑到保存技术的局限我们只采集了少量样品）和大量的木炭。

对 21 个浸水木头样品和 3 块木炭样品进行树种鉴定，发现有 4 个树种，分别是麻栎（*Quercus acufissima* C.）（山毛榉科栎属）、杜梨（*Pyrus betulaekolia* B.）、（蔷薇科梨属）、辽东桤木（*Alnus sibirica* F.）（桦木科桤木属）、刚竹（*Phyllostachys* sp.）（禾本科刚竹属）。

结合我国东部地区全新世环境研究结果，我们认为：

（1）龙山文化时期两城镇聚落周围生长着以麻栎林为主的阔叶林，阔叶林中还有杜梨、辽东桤木等乔木，林下有丰富的灌木和草本植物；在河岸和池塘周围则生长着刚竹林。根据从各类遗迹中采集土壤样品的浮选和植硅体分析结果，我们还可以知道，农田里种植水稻、谷子和小麦等农作物，农田周围有各类杂草。

（2）考虑到受人类活动和植物保存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在两城镇遗址中保存下来的木头样品主要是人类燃烧（炊煮、取暖、照明、烧制陶器、可能还有青铜冶炼）和建筑（私人居住和大型公共设施等的房屋、壕沟壕沟）等活动的遗留。

两城镇遗址大量木炭标本的发现说明龙山时代居民大量采集聚落周围的植物资源作为薪柴。两城镇壕沟中发现三个树种作为壕沟类建筑材料，两城镇遗址发掘揭露出的各类房屋遗迹说明，当时房屋建筑也需要大量的木头。事实上，古代人类还将植物用于很多其它用途，如药物、制作家具、制作各种生产和生活工具、动物饲料和配制染料等，只是这类植物遗存不容易保存下来，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

丹土与两城镇遗址出土玉器研究

燕生东¹ 高明奎² 苏贤贞³

五莲县丹土、日照市两城镇遗址是海岱东部沿海地区两个著名史前遗址，相隔仅 3.5 公里。它们以聚落遗址面积大、出土玉器多而闻名于世。丹土、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玉器在海岱地区史前玉器上占有好几个第一，如，是目前海岱地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史前遗址之一，有最扁薄的玉器（厚仅 0.2 厘米的玉钺、玉刀），最长的玉钺（达 30 多厘米）、最长的玉刀（50 多厘米）、直径最大的玉璇玑（超过 20 厘米），还发现了海岱地区唯一的 1 件史前玉琮、唯一的 1 件刻有兽面纹的玉簪等。目前，所发表有关图录和论文中把丹土和两城镇玉器均定为龙山文化时期。两城镇遗址由于考古工作开展较早，考古资料也较多，1935 年发掘的龙山文化墓葬 M2 内还出土了玉钺，两城镇遗址主要是龙山文化遗存，玉器归于龙山时期应无多大问题。而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丹土遗址则包含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时期的遗存。笔者在 2001 年在五莲县董家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内发现了一批玉石器，发掘期间又仔细观看了五莲县博物馆馆藏的历年来丹土等遗址出土的玉石器。后又蒙刘延常先生惠允，还有幸观摩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0 年在丹土遗址发掘的玉器和其他材料。我们认为，丹土玉器的年代归属存在着问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此外，丹土与两城镇玉器的关系、产地以及两个聚落之间的关系等诸问题也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一、丹土、两城镇玉器的年代问题

由于丹土、两城镇玉器种类中玉钺的数量最多，因此，本文全面收集、分析了海岱地区史前玉石钺，把玉石钺分为正方形、长方形、梯形和斜刃五型，并初步建构了玉石钺的从大伊山文化遗存、到大汶口、到龙山文化的编年框架。玉石钺的演变轨迹大体为，从顶部圆角，刃部外凸呈舌状，到棱角清楚，刃部外弧，到棱角分明，刃部微弧，最后变为平刃。根据玉石钺棱角、刃部的变化特征，可把海岱地区玉石钺的发展分为 4 个大阶段，大伊山遗存、大汶口文化早期为第一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期为第二阶段，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初期为第三阶段，龙山文化中期为第四阶段。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出现平刃玉石钺，到龙山文化时期除了个别较厚重的玉石钺（石斧）刃部略弧外，全为平刃。

根据玉石钺的演变轨迹，我们把丹土出土的玉器分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初期两个阶段。大汶口晚期玉器共 18 件，包括所有的弧刃玉钺、斜弧刃玉钺、1 件与玉琮同出的大型平刃玉钺、璧、环、环形饰、镞形饰、玉琮、筒形玉镯、璇玑等。玉璧、环、环形饰、镞形饰、筒形玉镯等都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常见的玉器；单节、节面仅刻画圆圈纹的玉琮与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非常一致，学术界一般认为良渚文化晚期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同时。龙山初期的玉器共 8 件，包括平刃玉钺、梯形玉刀、超大型玉刀、3 件直径均超过 16 厘米以上的璇玑和 2 件大型环形饰。目前，在海岱地区考古发现的玉璇玑主要发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直径都在 8 厘米以下，能够确定龙山文化时期的也只有在三里河遗址发现 1 件，且制作粗糙，调查品如临朐西朱封、安丘老峒峪、海阳司马台发现的璇玑直径在 10 厘米以上，但也未超过丹土的璇玑。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的璇玑齿牙短，龙山时期的长，而丹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内也发现齿牙较长的璇玑。因此，丹土出土的齿牙较长的 3 件大型玉璇玑时代应不晚于龙山初期，本文还分析了海岱地区史前玉石刀的演变轨迹，把丹土的玉刀也

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³ 五莲县博物馆

定在龙山初期。

两城镇玉器主要是平刃的长方形、梯形玉钺，大型玉刀、刻有兽面纹的玉铎、璇玑、玉刻刀（饰件？）等，正式发表的能确定是两城镇遗址出土的达14件，由玉石钺、玉刀的演变轨迹可知两城镇玉钺的时代属于龙山中期，其中，两城镇在1935年发掘的龙山墓葬M2出土了1件玉钺，玉钺、玉刀等形制与西朱封龙山文化中期大墓出土的玉器基本一致，玉铎的兽面纹样与龙山早、中期陶片上纹样一致。因此我们把两城镇玉器时代定为龙山中期。

二、丹土与两城镇玉器种类、形制、材质的比较

相似之处是都有各种形制的玉钺、玉刀、璇玑等。二者各出土了1件镶嵌绿松石的玉钺。二者的玉器如钺、刀、璇玑等都是同时期的同类型中制作最为精美者，个体最大者。丹土玉器的材质较两城镇复杂，但都见黄绿色玉器和乳白色大理石等。二者的玉器无论从种类还是形制看，区别还是很大的，但这主要是时代差异，反映的是前后发展关系。

三、关于丹土、两城镇玉器的制作和来源

笔者认为，丹土玉器中，材质多样的大部分钺、刀、筒形玉镯等多系本地制作，玉琮来自南部的良渚文化。而璧、环、环形饰、镞形饰、璇玑、部分玉钺等可能来自玉材丰富的辽东半岛。1922、1942年前日本学者在辽东半岛文家屯、东大山等遗址发现了大批的玉料、成品玉环、璧、璇玑、镞形饰以及它们的半成品、次品，还有制作玉环、璧、璇玑的大量玉芯，并发现了制玉工具等，材质均为黄绿色半透明的岫岩、乳白色不透明的白云岩大理石。日本学者如冈村秀典曾写过文章论述海岱地区的玉环、璧、璇玑等类玉器通过远程贸易从辽东半岛交换到山东。两城镇遗址还发现过玉料和治玉工具，玉器可能是本地制作，但原料可能多来自外地（辽东半岛），因为两城镇玉器多为属于岫岩玉类黄绿色玉。

四、丹土、两城镇玉器在海岱系玉器的定位问题

海岱地区的玉石器工业，在新石器中期属于中原磁山——裴李岗石器工业系统，而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属于北阴阳营——薛家岗玉石器工业系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体属于良渚文化玉石器工业系统。有学者认为海岱地区出现自己的玉石器工业系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才确定下来。丹土玉器有明显的过渡性，因为它包含了海岱系玉器如玉刀、璇玑、平刃玉钺、镶嵌绿松石的玉器、筒形玉镯等，良渚系玉器如琮、镞形饰、弧刃玉钺、横截面呈长方形的璧、环等，红山文化系玉器如横截面呈扁圆性的璧、环等，过渡性明显。就丹土玉器种类、形制特征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地域风格而言，包括临沂、日照地区的陵阳河、杭头、湖台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在内的玉石器可单独划为一个区域，我们称之为陵阳河—丹土类玉器，与花厅类玉器、大汶口—焦家类玉器相区别。两城镇玉器已属于典型的海岱系玉石器。就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玉器而言，除两城镇外，临朐西朱封和毗邻的昌乐袁家也发现了大批玉器，二者就种类和形制而言，有一定区别，可能昭示着两城镇类玉器、西朱封—袁家玉器类不同地域风格的存在。

五、以玉器为分析视角，探讨了丹土、两城镇这两个中心聚落的关系

据最近的考古系统调查，研究者根据遗址的分布、面积大小把该地区龙山聚落分为4个等级，丹土遗址是与两城镇遗址同时，并隶属于两城镇这个一级中心聚落的二级聚落。两城镇遗址规模巨大，发现了海岱地区最大的壕沟和数量较多、制作精美、形制硕大的玉制礼器，应是该地区龙山时期的中心聚落。通过上文的比较，丹土玉器的年代大部分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部分属于龙山文化初期，而两城镇玉器多属于龙山文化中期，丹土玉器与两城镇玉器不是同时代关系而是前后传承关系。由于丹土玉器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晚期所占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加之在丹土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环壕和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等重要遗迹和遗

物，我们可以肯定丹土是该区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因此，就玉器这个角度而言，结合已有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作为中心聚落功能的丹土遗址只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初期，而龙山早期偏晚到中期，两城镇在该区域的才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另外，该区域的系统考古调查却只发现 4 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而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多达 199 处，这似乎与丹土这个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心聚落的地位极不相称。但是，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的遗址不同时期文化埋藏往往高度重合，鲁东南地区如原定为龙山时代的五莲丹土、董家营、胶南河头、日照尧王城、胶州赵家庄、诸城薛家庄等遗址，经考古发掘后，都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存。显然，陶片等遗物的出露是以遗址的破坏程度为前提的。因此，那些未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下部也有大汶口文化遗存的可能。如此说来，以地面采集的陶片等遗物来断定一个遗址年代和性质，以陶片等遗物的分布来确定一个遗址的面积大小，以遗址的规模大小划分等级，这种田野作业方式，在中原、海岱地区应考虑其局限性。

科学思潮与早期国家探源

陈淳 陈洪波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本文试图从欧美学界对社会演变的探索历程, 介绍与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相关的一些重要思潮和学术流派, 希望对这一探索历程的了解为我们目前的研究视野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理论思。

1. 西方早期思潮

18世纪在英法发生的启蒙运动提倡一种人类历史进化的观点, 认为进步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特点, 它表现为一种持续的过程, 主要动力来自于个人渴望改善自身条件的不间断的努力, 以便获得更好的控制自然的能力。社会进步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 而且包括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 包括社会结构、政治、道德和宗教信仰, 这些进步都是相伴发生, 表现为一种直线发展的总体趋势。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思想家米拉波(V. Marquis de Mirabeau)、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亚当·弗格森(A. Ferguson, 1723-1816)、被誉为科学社会科学之父的孔德(A. Comte, 1798-1857)、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 1858-1917)等。

2. 摩尔根的文化进化论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被公认为研究社会发展和文明演变的经典和开山之作。他从对印第安人血缘系统演化的研究深入到对社会技术、制度和文化知识共同演化的层次。他提出了著名的人类文化的三阶段进化模式, 将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向文明的进化看作是普遍经历的发展过程。摩尔根将文字的出现看作是文明的开始, 并将人类的文明社会分为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社会两个阶段。

3. 马克思主义进化论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促使他们探索国家形成的原因以及作为一种压迫机构的真正性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对摩尔根初步萌发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和更加集中的发挥, 对国家所下的定义是: “实际上,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1928年提出了一种人类社会连续递进的发展模式: 原始社会被分为氏族前阶段、母系氏族阶段、父系氏族阶段和最终氏族阶段; 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 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 分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后者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在苏联和中国, 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长期以来对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阐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 历史特殊论

20世纪上半叶一直到60年代, 一种被称为历史特殊论或历史相对论的思潮在科学界流行。这一思潮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性的规律, 反对社会进化学说²。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 Boas)。博厄斯的人类学理论建立在两个关键的前提上。一是文化相对论, 博厄斯认为没有一种标准可以被用来对不同文化发展的相对程度和内在的价值作比较, 而必须从它们本身人群的意义来予以评判。二是历史特殊论, 每种文化必须作为一个独立发展过

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²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程的产物来了解。博厄斯提出，重建人类的历史并必须从每个民族的特点中来研究他们的文化。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加上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和传播迁移论的流行，使得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表现为一种彼此无关的独立研究，从跨文化比较来探索社会演变规律一度成为不合时宜的思潮和研究课题。

5. 新进化论的兴起

自 30 年代中期受苏联考古学的影响，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他的后期工作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来解释社会文化演变。他认为，中东和欧洲的文明起源和发展源于生态和人口的原因，提出个别文明的历史不是遵循一条直线向上的轨迹，而是一种能量与成功扩张最后又跌入衰亡低谷的过程。他还指出，文明演进的结果要比引起演变的原因有限得多，因此文明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要少于文化形态的差异。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加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社会文化演变，形成了一种所谓新进化论的思潮。新进化论提倡生态、人口和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有别于直线进化论所侧重的社会文化演变源于有才华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于是，从环境、人口、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来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在社会科学家中日趋流行。新进化论的两位主要的倡导者是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 (L. White) 和朱利安·斯图尔特 (J. Steward)。斯图尔特提出五种依次递进发展的社会文化类型来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秘鲁北部和中美洲的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几个地区是文明的摇篮，虽然这些社会文化相互隔离，但是都在原始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应对相似的问题、造就了相似的发展轨迹。

受斯图尔特的启发，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 (K. Oberg) 根据墨西哥南部低地哥伦布之前的印第安部落社会结构特点，于 1955 年总结了六种类型的社会形态，并首次提出酋邦 (chiefdom) 的概念，把它列为国家前的一种社会结构。这六种类型分别是：均一部落 (homogeneous tribes)、分散部落 (segmented tribes)、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酋邦 (politically organized chiefdoms)、联邦型国家 (federal type states)、城邦国家 (city states) 和神权帝国 (the theocratic empire)¹。

6. 弗里德和塞维斯的理论

1960 年，美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提出了一个政治社会演化模式来讨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区分不同成员的机制²，这一模式在他的《政治社会的演进》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³。弗里德根据社会等级差异标准提出的四种社会类型分别是平均社会 (egalitarian society)、等级社会 (rank society)、阶层社会 (stratified society) 和国家社会 (stage society)。与弗里德同时，美国人类学家萨赫林斯 (M.D. Sahlins) 和塞维斯 (E.R. Service) 利用民族学资料建立起一种推测性和高度一般性的直线发展序列来表述人类社会自游群 (band)、经部落 (tribe)、酋邦 (chiefdom) 向国家 (state) 的发展模式。

弗里德和塞维斯提出了有用的术语和概念，并建立了一种很好的参照框架来帮助我们研究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以及早期国家的起源。正如伦福儒和巴恩所言，这四种社会类型的划分并不意味着社会必定会从原始群进化到部落，或从酋邦进化到国家。我们也不应满足于将某些观察到的群体归入某种社会类型就大功告成，而是要解释为何有些社会会向国家演进，而有的社会却不能，以及为何有些文明程度很高的酋邦和早期国家最后会走向崩溃⁴。

¹ Oberg, K. Types of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Lowland trib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5, 57(3):472-487.

² Fried, M.H. 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tate. In: S. Diamond (ed) *Culture in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713-731.

³ Fried, M.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⁴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 年。

7. 后现代思潮

自20世纪下半叶起,一种后现代思潮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向社会科学界蔓延。这种思潮强调知识的主观性,认为所有现代社会是历史同样悠久的人类经验的产物,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标准来确定一种社会比其他社会的来得优越。新进化论所提出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并不能构建一批特定的社会形态,而只不过是些定义含糊的范畴罢了,其特征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相互重叠。许多真正的社会表现出皆有部落和酋邦的特点的混合。这种观点还认为,直线发展的模式无视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社会中存在的变异程度。比如非洲的酋邦在许多关键方面与波利尼西亚的酋邦不同,而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根本不同于新几内亚的部落。

最近,后现代主义者和过程进化学者(processual evolutionists)对新进化论将社会文化演变等同于直线演变的一厢情愿表示怀疑,认为社会文化演变明显远不是一种通过依次不同的阶段而日趋复杂的过程。即便是技术的发展也显示了一种多元和难以预测的特点。进步是一种主观的概念,今天没有人认为在技术发展和道德进步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个别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图像,它可以向上发展,也会向下衰落和崩溃,衰落的社会也不会倒退到它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原始阶段,在较高阶段获得的知识 and 行为会在社会瓦解后保存下来,然后在社会重新复兴过程中发挥作用。

后现代主义开始是对新进化论存在的缺点提出批评,但是其强调独特性和狭隘的偏见使得它后来对新进化论的所有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摒弃超越个案问题之上的研究,完全拘泥于孤立和特定个案的研究,排除对诸如人类起源、古代社会和文明的起源等一些重要问题的探索,排斥对创造物质文化最有意义的广泛问题进行研究,使得这种思潮又走到了一种极端¹。

8. 小结

研究人类社会文化演变和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思路一直在两种主要形式之间变换,一种是关注个别事件和具体特征的历史学研究,一种是关注社会文化一般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研究。19世纪摩尔根最早提出了三阶段的早期进化模式,使学界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激励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最终发展方向。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学者在摩尔根和马恩社会进化思想基础上提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模式,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而被法定为一种真理并赋予一种政治纲领的地位,在苏联和中国等国家里成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在中国的考古研究中,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加上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们的思维长期被定格在摩尔根和马恩提出的社会进化模式上,并被奉为解释历史现象和社会发展的圭臬。反而把20世纪国际社会科学理论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加以排斥。使得学者们在对考古现象进行社会分析时,只会从摩尔根和马恩的论述中来寻找解释的依据,难免出现公式化和简单化的现象。

本文从科学思潮发展的历史背景,回顾了欧美自启蒙运动以来文明与早期国家研究思潮的变迁。目前中国以史学导向的探源成果在国际上饱受批评,我们也许可以从科学思潮的发展中找到分歧的原因。其中不但有学术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可能也有我们对国际学术思潮发展趋势的漠视,希望我国的学者能够从中获得启发,调整视野,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¹ Trigger, B.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城市·都城·国家

——探索早期国家形成进程的途径之思考

段宏振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研究方法

严格说来,文明与早期国家均为一种抽象的非物质性的概念,与此类似的还有部落、部落联盟、酋邦等。物质性的概念一般见于考古揭露出来的遗存,如城镇遗迹、城市遗迹等。但是,城市则是一种既有物质性又具有非物质性的特殊概念,考古发掘出的遗迹是具体的,而学者们对于“城市”概念的具体把握又存在分歧。因此,在研究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进程时,文献理论层面的“虚”与考古遗存层面的“实”有机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在某些时候与某些方面,以考古遗存为基础的探索与研究可能更为有力一些。这样可以避免单纯从“理论”演绎到“理论”,或以“理论”演绎到“实物”。如果将从文献归纳出的“理论”与从“实物”归纳出的“理论”能够有机结合起来,可能对探索早期国家形成之路更具裨益。

二、早期城市、文明与早期国家

正因为如此,给这些项目作出一个圆满和公认的定义是困难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做到的。因此,我们认为,与其争论它们的概念含义,不如根据其本质属性将它们从某种环境中辨别出来,即通过相对性来辨明其身份。对于早期城市,我们能将它从乡村聚落中区别出来就是对其定义的很好把握,如果再进而能将村落、城镇、城市分层区分开来则更是研究的深入。同样,对于文明与早期国家也是如此。

最早的文明社会应该在最早的城市里出现,换言之,城市与文明应该基本同步。文明与早期国家不能完全等同,文明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生存方式,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而国家是人类生存方式中的一种高级组织形式。

三、从中心城市到都城

与探索文明的形成进程一样,探索早期国家的形成进程也可以从某一地域的城市发展进程入手。城市的出现催生了文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都城的出现即催生出了早期国家。从中心城市到都城的演进历程,也即国家诞生的历程。因此,都城的认识与判定也就成为早期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对于都城内涵的把握,参考文献理论体系的框架,重点着眼于考古发现中的都城遗址标本。在中原地区,目前年代最早、考古资料积累最多、与文献理论体系中的都城最为接近的遗址是二里头。因此,二里头遗址将是目前研究早期都城内涵及形成的重要参照标本。较之为晚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乃至更晚的殷墟也可作为研究的参照。较之为早的龙山时代诸城镇或城市遗址,是研究都城发生源头和雏形都城形成的重要依据。

四、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

实质上即是都城的形成途径。很多学者已将人口增殖、社会分层、贸易、战争、城市发展、洪水治理等等列入到早期国家形成的途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将这些诸多因素串联起来扭结在一起的是城市这种物质性的载体,反映在精神层面的本质就是宗教与祭祀。换言之,是某个城市利用宗教与祭祀将周围一定地域聚拢并控制起来,在某种特殊机遇下逐渐演进发展成超级城市——都城,于是早期国家也就随之诞生了。

山东先史时代所见礼制的起源

宫本一夫

(日本九州大学人文学部)

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山东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表现在墓葬的变迁上。比如，我们可以观察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中中期至晚期的墓地中，各时间段上的墓葬规模的层次差别与墓葬的分布排列。墓葬在构造上最初没有层次差别，后来出现大小之别并且这一格差渐次扩大，同时可以观察到，这种格差在以小组为单位的墓葬中逐渐明显。这一现象意味着血缘集团基础上的阶层差别的扩大。位于这一社会格差延长线上的龙山文化时期，正如在朱封遗址所能看到的，酋长墓墓地逐渐从墓地中独立出来，而且酋长墓采用了棺槨结构。

此外，阶层差别不仅表现在墓葬的规模及构造上，随葬品尤其是随葬用的陶器器种亦与阶层差别相对应。墓葬规模上存在着阶层差别的大汶口遗址中，一般成员的墓中仅随葬鼎、壶、豆等日常生活用的陶器，此外，在这些器种的基础上，杯、鬶、盃或尊等酒器的随葬，则视墓主的阶层而定。不同阶层随葬的陶器的种类有严格的规定，酒器被上层阶层的人们所独占，这意味着他们曾经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在呈子遗址还可以观察到，这种阶层差别与随葬陶器器种差别相对应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换中，进而演变成为一种坚固的原则。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样的阶层秩序变得更为固定，最高阶层的人们除了各种陶器外，还随葬鬶、壘、鼎、豆等。

可以认为，这样的阶层秩序与酒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种的阶层秩序，所表现的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由于龙山文化时期随葬陶器的构成，与后来商代青铜彝器所体现的阶层秩序及构成相近，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很有可能龙山文化时期的礼制秩序在后来不断发生变化，并为商代所采纳。

20 世纪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海岱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最先开展的地区之一，还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由准备期转入初步探索期的主要热点研究区域。因此，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全局意义上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一、1928 年至 1976 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

1928 年至 1976 年期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及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索海岱地区商代以前的文化遗存，即发现并确立了龙山文化（现在一般称为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及其它们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此外还发现了年代约在夏商时期的岳石文化遗存。另一个方面是根据考古学研究所积累的资料，初步探索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即探索海岱地区的私有制起源问题和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问题，引发了文明起源问题的正式提出。

二、1977 年至 1985 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

1977 年至 1985 年，是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时期，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一书出版之后开展起来的对大汶口文化社会形态的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和海岱历史文化区概念，还对原始文字、早期铜器等文明因素进行了初步的专题研究。并开始注意到典型龙山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

三、1986 年至 2000 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

1986 年至 2000 年期间，是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

（一）1986 年至 1989 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

这一期间，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及研究成果，除进一步建立海岱地区先秦文化的编年体系和文化谱系，一些重要发现相继问世外，主要是召开了两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对大汶口文化墓葬又进行全面研究，开始重视对龙山文化城址及山东龙山文化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等的研究，对东夷的研究受到关注，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等。苏秉琦对海岱地区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和有关研究方向的指点，对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有极大地推动与启示作用

（二）1989 年至 1991 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

1989 年至 1991 年是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历程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山东龙山文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再次发现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和几座城址，以及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殉人墓，发现了重要的遗迹现象和遗物；二是召开了“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极大地推进了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两次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亦对海岱地区文明起源问题产生了新认识。此外，新发现并确认了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文化，使泰沂山北侧的新石器文化追溯至距今 8000 年前。还开展了对大汶口文化墓葬、陶器刻划符号、商品交换等问题的讨论，全面探讨了东夷文化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历史贡献。

（三）1992年至2000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

1992年至2000年期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全面展开，与探索海岱地区文明起源有关的一些专题研究开始得到加强。如东夷文化史研究，早期农业经济研究，房屋建筑研究，史前祭祀遗存研究，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研究，陶器、彩陶与玉器研究，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研究等。其中，对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有明显推进的是：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进一步发现及其研究的深入，对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原始文字（刻符）和墓葬的进一步研究，开展聚落形态研究等。

1. 一批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等重要遗存的发现。这些考古发掘资料的问世，使海岱地区距今7000年至商代的史料空前地丰富，极大地促进了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

2. 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的进一步研究和都邑聚概念的提出及其进一步的探索。

3. 对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原始文字的探索。

4. 对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进一步研究。

1992年至2000年期间，通过对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研究以探讨海岱地区文明起源问题，主要是对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的进一步讨论和对山东龙山文化大墓的研究。高广仁先生提出花厅大墓的“文化两合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应是该地区大汶口文化部落被征服。对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研究，于海广认为山东龙山文化中晚期高规格的墓葬中的现象，为山东龙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增加了有力的证据。刘莉则通过对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的研究，探讨当时的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

5. 海岱地区聚落考古研究的开展。

在海岱地区运用聚落考古方法，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主要是对日照两城地区的探索研究。1995年开始对两城镇一带进行区域考古调查，7年调查范围500平方公里，发现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周代、汉代遗址和地点1000处。由此，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将展示出良好的前景。栾丰实分析1995年至1998年四年调查的资料，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以莒县盆地为主的陵阳河区存在着三个等级的聚落。至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区域中心由陵阳河区一个，增加到三或四个，各代表一个古国，又聚合成一个更大的统一体。其中最高一级聚落只有两城镇一处，二级聚落有三至四处，三级聚落有20多处，四级聚落有200多处，称之为“两城方国”。

上述这些方面的研究进展表明，1992年至2000年期间，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状态，其中尤以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为最主要的热点。虽然在这时期产生的对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研究的许多认识，特别是对一些城址的判断，一些聚落群的划分，“都、邑、聚”的分析等，还属于一种推测，但这种努力，开拓了文明起源研究的领域；尤其是“都、邑、聚”概念的提出及其在研究中的运用，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对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开展的日照两城镇区域考古调查研究及其有关的研究突破，将开拓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新的局面。

海岱龙山文化社会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文明若干因素的萌芽

高广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海岱龙山文化社会是初级的文明社会，其主要特征在考古学上表现为：

一、古国“都”、“邑”、“聚”的三级结构

海岱龙山文化的城址迄今已发现约二十处，分三等。以大型城址为重心，包括中小城址、聚落，形成特大遗址群。《史记 五帝本纪》追述，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考古发现与这“都”、“邑”、“聚”的古国三级立体结构相当。

二、“万邦林立”与古国的分辨

除胶东外，海岱区各地城址星罗棋布，古国林立。每一个古国势力所及范围只有纵横数十公里。城址有分群现象。可分鲁西北、鲁北、鲁东南和鲁中南四群。每一群内城址之间关系密切，可能源自同一族群。王的兴起使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发生裂变，出现若干个小实体——古国，亦即史家所谓的“国族”。各国族间必然会进行更高层次的掠夺与兼并。

三、礼制初成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秩序是靠礼制、而主要不是靠宗教建立的。王权之上。王权以各种“礼”的手段来规范贵族内部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遏制贵族的无度贪欲，使整个社会得以以王权为轴心有序地运行。朱封、尹家城墓地上表现出丧葬礼制化的明显迹象。

四、氏族躯壳的保存

在尹家城，王室、贵族与一般族众仍安葬于同一墓地。古国多层金字塔式结构笼罩在旧的血缘组织外壳之下。血缘组织外壳的长期存在，是“国族”产生并延续久远的条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之一。

五、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大汶口文化后期，私有财富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主要取向。夸富是炫耀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王权、礼制出现后，财富已不再是社会地位的首要标志；礼器所标示的王权赋予贵族的身份成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取向。一般说来，“富”、与“贵”形影相随。礼器本身也是贵重物品，但由于两者的社会功能不同，礼器的价值不在于材质，而在于它所体现的王权权威性。这正是财宝与礼器的一个不同。龙山文化的礼器是上百件陶器所不能换取的。

六、礼器的生产与王室经济的出现

王权通过“合礼”的渠道聚敛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流向之一是发展王室经济，以满足王室、贵族的奢侈需要和包括礼器在内的政治需要。王室控制的特种工艺生产礼器，如蛋壳陶、鼍鼓和彩绘棺槨等，特别是由圭、璋、（各类嵌有美石的、带扉牙的、齿刃的）钺、刀、牙璧、琮等玉礼器群，是三代玉礼器的一个主源。龙山文化及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精华是由王室经济生产的。

七、原始文字的出现

大汶口文化已经有了一定地域共识的陶文。海岱龙山文化出现了丁公陶文几乎是必然的。况且，这在龙山时代已不是孤证。

龙山时代——古国时代

张学海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已经普遍使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名称。学者对龙山时代有不同界定。如同以仰韶文化命名的仰韶时代，龙山文化也应界定于龙山文化时期。应当依据实际情况把海岱龙山文化的开端提到距今 5000 年，与目前多数学者对龙山时代上限的界定相一致。下限定于公元前 22 世纪，介于仰韶时代与夏代之间。使该定名更为科学严谨，文化与时代名及社会发展阶段互相吻合，以利理解与研究。

龙山时代的社会已经是个复杂的分层社会。生产力长足进步，人口与聚落急剧增长。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农业与手工业飞速发展，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技艺、效率大为提高，产量与质量大幅提升，似又出现了商品生产，社会财富在快速积聚。私有制取得绝对统治地位，贫富两极分化。墓葬、住房、聚落、聚落群与城都已严重分化，形成四五个乃至更多层级。出现了早期城市。以上表明龙山时代的社会已经是个贫富分化、社会分化异常严重的分层社会，已跨越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已由原始过渡到文明。这一过渡大约是从仰韶时代中期开始的。

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国家大量涌现的时期。古国是早期国家，中国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而诞生，国家是社会复杂化进程达到氏族制已无法承载的产物。国家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国家诞生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产生，一种新的垂直行政管理机制取代了部落制。只有确认最早的古国，找到一批龙山时代古国实体，才能证明国家的诞生和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海岱文化区聚落时空关系经历了单独、成组、成群存在的变化以及聚落群的演化过程，体现了氏族、部落和国家的发展过程，证明国家诞生于距今 5000 年前后的仰韶、龙山文化之交。部落向国家过渡，首先体现在部落中心（聚落群中心聚落）转化为政治中心即都城上。一个比较清晰的实例是大汶口古国。由上证明：中国史前历史是沿着氏族—部落—国家的道路发展的。不存在酋邦时期，国家的诞生是自上而下改变管理体制的结果，非暴力的产物。

聚落群的性质先是部落，后是国家。龙山时代聚落群多经历了由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与聚落群共存的还有成组与孤单分布的聚落，包括那些极小的聚落群在内，他们仍是些小部落与独立氏族。所有古国、部落与独立氏族构成五帝时代的“万国”。“万国”言其多，非确数。“万国”证明当时“国家”之多。综合考察较为肯定的古国和可能是古国实体的聚落群。可对我国早期国家基本形态作出概括。尽管龙山时代国家、部落、氏族共存，仍称古国时代为宜。

古国时代何时进入方国时代、方国的标志为何均尚需研究。就影响而言，尧舜禹时代的唐、虞、夏三国应已是方国。目前不妨暂以尧舜禹时期作为方国时代的开始，把公元前 22 世纪作为古国方国时代的分界。

黄淮地区史前考古新收获 ——连云港藤花落遗址与邳州梁王城遗址

林留根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一、2003~2004年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发掘收获

2003年11月~2004年4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连云港市文管会、连云港市博物馆组成的藤花落考古队对藤花落史前古城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本次发掘总面积为1,335平方米,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新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房址13座(F36—F48)、灰坑51个(H151—H201)、灰沟15条(G14—G28)、大型红烧土祭祀遗存1处、石板路1条(L5)。另外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偶蹄类动物足迹、水田遗迹以及北辛文化时期的遗存等。发现的房址和大型红烧土祭祀遗存对研究藤花落古城的平面布局提供了新材料。大型水稻田遗存和偶蹄类动物足迹的发现对研究藤花落遗址的稻作农业和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现将本次发掘的主要发现及收获介绍如下:

大型祭祀遗存由F48、大型红烧土广场、烧土堆和祭祀坑组成。房址及其周围垫有两层较纯净的灰黄土,形成高出周围地面0.2米左右的小高台,小高台平面呈“凸”字形。F48就座落在小高台的中间。房址现存基槽,单间,拐弯处圆角,整个平面呈“回”字形,东西长6.32米,南北长4.75~5米。由于房址的四围基槽内未发现有门道的迹象,因此判断其前方的两排柱洞可能是该房的木构阶梯遗迹,由阶梯拾级而上,进入房子。

在F48所在的小高台周围,分布着大面积的连成片的红烧土堆积,同样开口于⑥层下。从已揭露的情况计,红烧土堆积的范围达300多平方米。从红烧土堆积的形状、范围、构成以及包含物可以说明该堆积不是房子的倒塌堆积,而是人工有意铺垫而成,应是以F48为中心的大型活动广场。在红烧土堆积的南部及东部发现有3处烧土堆。烧土堆的表层为含有较多碳黑的灰土,其下为块状的烧土,中间部分略鼓起,整个座落在红烧土堆积之上。另外,在红烧土堆积的东部,同层位下发现有一灰坑,编号为H199。该坑内发现有单个少年头骨及一堆陶容器。陶器为厚胎粗砂陶,质地粗疏,较零碎,从器形分析当是釜式缸形器。结合F48、大片红烧土堆积推测,该坑可能是祭祀坑。

偶蹄类动物足迹:此次发掘,在探方T4545的西北部,④层下⑤层层表清理出了较多的偶蹄类动物足迹。足迹大小均有,主要集中于T4545的西北角,分布看似杂乱,实则有一定的规律,多数足迹顺着西北—东南走向。与同探方内发现的龙山时期的道路L2的方向基本一致。另在足迹分布的范围内发现3个径约5厘米的小圆洞,成排分布,间隔在0.5米左右,推测可能是小木棒之类,支撑木栅栏的。从偶蹄类动物足迹的形状、大小、及其清理的情况,我们推测该类足迹是属于牛脚印。

在藤花落遗址中发现非常丰富的稻作遗存,灰坑和城壕等遗迹中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在内城中间也曾发现龙山时期的稻田遗存。通过1998、1999、2000年对外城南、城壕的解剖和钻探发现在南城壕的外面可能存在着面积更大的水稻田遗迹。遗迹近长方形,西北、东南端尚向探方外延伸,东西现长约11米,南北宽约4米,深0.3米左右,揭露面积44平方米。堆积为青灰土,土质较松软,有粘性,表面密布大量的冰裂状纹,夹有黄绿色斑和较多的铁锰结核,出土有零星的烧土颗粒和陶片。从ST1与G27相连,平面密布有众多的冰裂状纹,土质松软有粘性,含有较多的铁锰结核等情况推测,ST1表现出水田遗迹应有的性状。

本次发掘主要在内城的东北部新发现了8座圆形房址、1座大型长方形房址及若干灰坑,从而为以G1为界,沟北主要为圆形房址,沟南主要为长方形房址的聚落布局特点提供了重要

材料。以 F48 为中心，环绕着大型红烧土广场以及多处烧土堆、祭祀坑等单元组成的重要遗存，对研究龙山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偶蹄类动物足迹、水田遗迹的发现为研究古代聚落农业和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2004~2005 年邳州梁王城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2004 年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等相关考古人员组成的梁王城考古队对梁王城遗址进行了首次主动科学发掘。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

梁王城遗址位于邳州市的北部，距市区 37 公里，隶属戴庄镇李圩村。遗址上现保存有高出周围地表 1~3 米的城墙，平面近长方形。南、北城墙保存较好，西城墙的南部大多已被挖运河时所破坏，南城墙现残长 900 多米，北城墙残长 800 多米，南北城墙相距约 1100 米，遗址总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发掘总面积约 1100 平方米。发掘结果表明，文化层堆积深厚，内涵丰富，地层堆积从早到晚依次为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周文化层、春秋战国文化层、北朝—隋文化层以及宋元文化层等。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中共发现儿童陶棺葬 6 座。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以陶鼎作为葬具。陶鼎系打成大块的陶片，在墓底以鼎口沿、腹片相叠并排铺垫一层，然后把儿童放置其上，再以打碎的陶片盖满全身。人骨侧身，头朝东，面向北，下肢稍弯曲，骨架保存较完好，经鉴定其年龄在 5 岁左右。随葬有一件小器盖。葬具经拼对、复原，为 2 件器物，一件为折沿敞口深腹扁凿形足鼎，另一件为折沿敞口球形腹扁凿形足鼎；M7，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 95°，墓口长 1.5 米，宽 0.55~0.6 米，深 0.4 米，距地表 3.62 米。北距 M6 约 0.5 米。埋葬一儿童，亦以陶鼎作为葬具。葬法与 M6 基本相同，均把陶鼎打碎，底下铺垫陶片，上面放置墓主，再以陶片覆盖，但是在墓主的腹部未见有陶片铺垫及覆盖。人骨侧身，头朝东，面向南，下肢稍弯曲，骨架保存较完好，年龄鉴定在 5 岁左右。随葬有一件喇叭形口鼓肩壶、一件杯形圈足尊、一件浅盘喇叭形圈足豆等器物，前两件置于腹侧，后者置于脚侧。并于墓主的盆骨前方发现有一个狗的下颌骨。另外在墓主的颈部发现有两件玉管，长均为 1.1 厘米，应是墓主生前戴在项上的饰品。陶葬具为折沿粗篮纹鼎，由于陶片较少，无法复原。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中还发现了 5 座房址。F8 和 F9 保存较好，均为浅地穴房址。F8，浅地穴房址，平面成圆角长方形。红烧土倒塌堆积不仅覆盖地穴，并向外蔓延。地穴东西长 5.4 米，南北宽 3.24 米，深约 0.4 米，近正方向。房内发现中心柱洞 1 个、边柱 7 个。在房址的里面及北边各发现一件折沿垂腹扁凿形足陶鼎。

在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有 1 座浅地穴房址，编号为 F7。房址的东南大部被 G6 所破坏。在房内发现了六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及一个头骨，且多有叠压现象，七具人骨经江苏省文物局现场初步鉴定，除去性别不清的 6 号人骨外，房址内的死者均为女性，且老少都有，我们推测死者所在的部落被另一个部落所入侵，男子在外应敌，成年女性和小孩则躲避在房内，最终罹难。在房址的西南部有两大堆炊食器，多数比较完整，为龙山文化早期的典型器物。

梁王城遗址的下层堆积为大汶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与其北部的刘林遗址及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有着重要的关系，对研究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以及黄淮地区的文明起源等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 F7 的房址内，发现了七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对探讨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

酋邦社会变化过程的考古学观察 ——玻利尼西亚酋邦考古学研究的启示

焦天龙

(美国 Bishop 博物馆)

如何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和定义龙山文化的社会组织形态，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龙山文化社会组织水平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学者对“酋邦”或“国家”的不同理解。本文利用玻利尼西亚(Polynesian) 酋邦考古学研究的启示，指出酋邦社会的复杂性，并建议用动态的观点来综合研究龙山文化社会的形成和变化过程。

对玻利尼西亚酋邦社会形成和变化过程的考古学观察，主要问题可分为以下九个方面：

1. 人口问题。在玻利尼西亚，人口的数量往往和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成正比。
2. 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3. 经济问题，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社会组织的演变关系，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4. 劳动分工问题。不同的行业日益专门化是玻利尼西亚各酋邦的总的发展趋势。
5. 财富的积累。主要食物储藏设施研究。
6. 聚落形态的变化。绝大部分群岛都经历了由最初的聚合式的村落到分散的家居的变化过程。但大型的聚落从未形成过。
7. 公共建筑的功能与形态。几乎所有的玻利尼西亚酋邦社会都有专门的仪式或公共建筑，但在不同的岛屿上，这种建筑的功能差别是非常大的。
8. 战争问题。战争在所有的玻利尼西亚酋邦社会的进化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并不是在所有的岛屿都存在防御设施。
9. 社会分层问题。明显的趋势是社会分层不断扩大。

太平洋考古学界对玻利尼西亚酋邦社会的研究，对于研究龙山时代社会形态的演变是有启发作用的。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认真思考：

1. 酋邦社会是复杂的，社会分层、权利结构和经济形态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区域差异。龙山时代是否也存在这方面的差别？如果有的话，如何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划分？
2. 聚落形态不一定都能反映社会结构的水平，夏威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Hawaii 的酋邦在玻利尼西亚中社会分层最多，但从未形成过大型的聚落。
3. 神权与酋长权的关系相当复杂，有些酋邦将二者合为一体(如 Hawaii)，有的则完全分开(如 Marquesas)。龙山时代诸文化是否也有差别？如何从考古现象中研究权力结构？
4. 王权或酋长权的世袭是玻利尼西亚酋邦社会的普遍特征，龙山时代的诸文化是否也如此？应该探讨这种可能性，而不应受制于文献记载的所谓“禅让制”。这实际上关系到中国早期国家的王权世袭制度的起源问题，也是探讨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

青铜器~初期铁器时代辽东东部地区社会及其进程过程

吴江原

(韩国 高句丽研究财团 副研究委员)

青铜器时代,在浑江和暖河流域的辽东东部地区,形成了与周边地区相区别的地域群。即,辽东东部地域群,仅以青铜器时代作为基准的话,它是泛指共伴出土石棺墓,条状附加堆文口缘土器,竖板耳土器,各种钵形土器,三角凹底添入石镞,打制亚腰形、梯形锄,长方形、舟形石刀,黑曜石器 etc 等遗物复合的地区。据迄今为止的调查,其空间范围为帽盔山和老秃顶山以及连结龙岗山脉一线的以东,鸭绿江以西,头道松花江以南,其核心地区则是能够典型地确认出上述共伴关系的桓仁和通化沿线的浑江流域。

辽东东部地域群的青铜器时代~初期铁器时代的遗物遗迹,如以金属器(青铜器,铁器)和有茎式磨制石剑以及两翼有茎式石镞等虽为石器却能观测得到其技术性和革新性的石制品的共伴与否作为基准,则可划期为4个阶段。

第I阶段是:制造的较为粗造而且其形态比较单纯的石器共伴出的阶段,其代表遗迹为凤城东山上石盖墓,桓仁大梨树沟石棺墓,通化万发拨子2期层。第II阶段是:磨制石剑和两翼有茎式石镞等新型式和新器种共伴出的阶段,其代表遗迹为桓仁狍圈沟,通化拉拉屯,集安大朱仙沟等。第III阶段是:各种青铜器和战国燕系遗物相共伴出的阶段,其代表遗迹为宽甸赵家堡子石墓和通化万发拨子3期层等。第IV阶段是:铁器等共伴出的阶段,其代表遗迹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通化万发拨子4期层,长白干沟子等。

通过万发拨子2期层中共伴出的袋足鬲和镂空圈足豆等,可将第I阶段编年为公元前12,11~8世纪;通过有茎式磨制石剑和两翼有茎式石镞的共伴关系在辽东北部地域的二道河子阶段比较分明的事实,可将第II阶段编年为公元前7~5世纪;通过中细形铜剑为代表的土着青铜器和战国燕系遗物(高柄豆,铁镞,铁刀子,铁收获刀,铜戈,明刀钱…)共伴出的事实,可将第III阶段编年期为公元前4~3世纪,通过西汉系遗物(灰色绳文土器,八铢半两钱,铁镞,铁刀子…)和吉林中部地域泡子沿类型的遗物(铲形铁镞,金耳饰…)共伴出的事实,可将第IV阶段编年为公元前2~1世纪。

然而通过上述划期可估知,在辽东东部地域,事实上直到公元前4~3世纪金属器(青铜器)才得以普遍化。带有聚落遗迹的分布也相对孤立分散,加之其中心聚落和中心住居址不易发见等特征。文化的变动现象亦不显着。为此可将辽东东部地域的青铜器文化归纳为“石器中心”,“缓慢的社会构造”,“水平的位阶”,“石墓”,“生业经济”等。即,处于“部族社会”和“生业经济社会”阶段。

此种社会构造的根本性的变动则发生在进入初期铁器时代以后的公元前4~3世纪。即,公元前4~3世纪,尚处于平等关系并且具有很强的血缘性的集团,他们在部族长的率领下生活在单纯构造的小规模聚落里,为了解决自身生计便施以定居农耕为中心经济行为。这种青铜器时代的石器为中心的部族社会逐渐转变成为初期铁器时代的君长社会。其构成员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化和位阶化,并出现为统治者专门生产出奢侈品和物品的专业手工匠人,而且这些物品又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相互进行交易。该时期的君长社会(酋邦社会)的断面,可以通过副葬有大量青铜器和200余枚货币(明刀钱)的君长级墓葬(桓仁大甸子大石盖墓)便可确认得到。

在公元前4~3世纪所发生的向技术社会的转换,到公元前2~1世纪则更加加速化,在辽东东部地域的物质文化从青铜器为中心转化为铁器为中心,与此同时,社会构造亦发生重大变化,具备有大型环壕和防御性沟的聚落开始登场。然而该时期的变化中,最为引人注

目的便是，从石棺墓到积石墓的转变。该时期出现的积石墓，除了与石棺墓截然不同的构造和形态之外，还施行有在遼东东部地域则非常生疏的火葬和多人葬以及洗骨葬，这一点上，它的出现本身便带有划期性。

综上所述，遼东东部地域在公元前 12,11~5 世纪为止，尚处于缓慢构造的“部族社会”和“生业经济社会”，而到公元前 4~3 世纪便受到遼东其它地域先进金属器制作技术和关联文化影响，从“单纯君长社会”转变为“政治经济社会”，到公元前 1 世纪前后则发展成国家直前阶段的“复合君长社会”。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Kangwon Province of Central Korea.

Hyuk-Jin Ro

Professor of Archaeology in Dept. of History Museum Director

This paper introduces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their and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the Mountain East of Kangwon Province, which geographically occupies eastern region of mid-central Korea. Most of major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is region had been formationed in the North Han River Valley, the mainstream river of the Mountain East of Kangwon Province. The unique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North Han River Valley seems to have consistently impacted on cultural formation in the region throughout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times - from ca. 6000 BC upto AD 300. Focused on this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formation and geomorphological nature, this paper delineates major cultural traditions from Neolithic upto state formation stages, and establish the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史前财富私有化的起源

——湘西北澧阳平原个案的研究

裴安平
(南京师范大学)

一、财富私有化起源的证据与特点

汤家岗墓地的发现是中国史前财富私有化起源的最早标志，距今 6500 年。

(一) 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墓地简介

1979、1990 年遗址前后二次发掘，发现汤家岗文化聚落公共墓地，共有墓葬 160 余座。按随葬品组合与数量，所有墓葬可分为三类。A 类，数量虽少，随葬器物却最多，并随葬独特的白衣红陶盘，推测其身份可能系聚落管理人员。B 类，数量也少，随葬器物也较多，并有纹饰复杂诡谲充满神秘色彩的白陶盘，推测墓主可能系宗教神职人员。C 类，平民，一般每墓仅有普通陶器 2~4 件。

(二) 汤家岗墓地所显示财富私有化的特点

1. 只见财富私有，不见生产资料私有；
2. 财富、私有、地位三位一体，1/10 的少数人拥有约 1/2 的财富；
3. 聚落内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管理的作用强化。

二、财富私有化起源的背景

(一) 人类的生存压力大幅增长

1. 聚落数量成倍增加

距今 9~8 千年，12 处；距今 7 千年，17 处；距今 6 千年，46 处。

2. 聚落规模大幅扩展

距今 9~8 千年，平均面积 7960 平方米；距今 7 千年，平均面积 13500 平方米；距今 6 千年，平均面积 15850 平方米。

3. 二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大型聚落日益增多

距今 9~8 千年，1 处；距今 7 千年，5 处；距今 6 千年，13 处。

4. 人口成倍增长

假设相同的面积承载相同的人口，那各时期就有如下人口比例关系。

8 千年：7 千年：6 千年 = 1：3：8

5. 聚落活动面积与人均土地占有量大幅减少

距今 9~8 千年，各聚落平均活动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平均活动半径 ≥ 4 公里；

距今 7 千年，平均活动面积约 35 平方公里，平均活动半径 ≤ 3 公里；

距今 6 千年，平均活动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平均活动半径 ≤ 2 公里。

各时期聚落活动面积与人均土地占有量的比例关系是：4.16：3：1。

6. 生产的投入激增

由于人口增加 8 倍，土地只有彭头山文化时期的 1/4；因此，要维持早晚同样的生活水平，那各时期单位面积内的劳动投入比例关系就是：

8 千年：7 千年：6 千年 = 1：9：32。

启示：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应该是，人类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土地资源的相对萎缩。财富私有化的起源实际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应对生存挑战的根

本性举措。

(二) 生产工具进步缓慢

距今 8 千年以前彭头山文化工具的基本概况是，以打制石器和骨木器为主，磨制石器甚少，器形轻薄。

距今 7 千年以前皂市下层文化工具的基本概况与前期相似。1986 年，临澧县胡家屋场遗址发掘，共发现石器 215 件，其中打制的占 89.77%，磨制的仅占 10.23%，包括 8 件石斧在内总共 22 件。

距今 6 千年大溪文化工具的基本概况可以汤家岗和城头山遗址为例。1978 年，汤家岗遗址第一次发掘，在 308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仅发现石斧 8 件；1996~97 年，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壕发掘，出土的工具仍沿袭过去传统，多骨木器，有骨耜、骨耒、骨铲、骨钻、骨凿、木刀等。

启示：虽然打制石器不断减少，磨制石器不断增加；但距今 9~6 千年期间，澧阳平原的生产工具仍始终以骨、木器为主，并表明仅依靠当地工具的改良根本不足以缓解人类日益增加的生存压力。

(三) 手工业与私有化起源的关系

以陶器生产为例。

1. 关于普通陶器的生产

城头山城址中部，94 年发现一处窑场，共出土陶窑 8 座，多数属大溪文化早、中期，一座为屈家岭文化。窑场中，除陶窑外还有料坑、储水坑，以及工棚等相关设施。在陶窑中，有的专门烧造一种陶支座，有的专门烧造红烧土疙瘩。如此专业完整的窑场，在长江流域已有的史前考古中还属少见。

不过，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尽管窑场的发现证实普通陶器的生产已初具分工化、规模化、专业化趋势，但其生产却并未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手工业与农业社会分工的迹象也不明朗。

理由之一：窑场规模大，设施齐备，位置又靠近聚落中心，使用期也特长，前后近千年。因此，它应该是聚落集体所有，长期使用，并生产普通陶器的中心窑场。

理由之二：假如窑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某一小集体或小型血缘单位，并以商品生产和获利为目的，那生产对象和过程就应受价值规律影响。然而，历经千年，却没有任何按市场组织生产的迹象，反而显出有一种隐藏的因素在长期控制它的生产目的和产品种类。

理由之三：当整个社会正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前提下，农业应该是聚落劳动投入的主要方向，应当不会允许部分劳动力完全脱离农业。此外，在农业还不可能有较多剩余产品的前提下，类似陶支座和红烧土疙瘩等普通陶器都要用粮食来交换，想必社会也缺少相应的经济基础。对普通聚落成员而言，粮食也是根本，是最大的财富，也不可能轻易接受那种交换。

理由之四：距今九千年以来，澧阳平原史前各文化遗址中都会出土大量废弃、残破的陶器和陶片。如果陶支座、红烧土疙瘩都成了商品，都要通过交换才能换取，那任何时代、任何聚落的普通陶器都会大量减产，都不会有现在考古见到的那么多；而且聚落的大多数成员无论是出于节约粮食还是趋利的目的，都会想方设法甩开陶工自己干，各个聚落也会随之成为史前专业的陶器制作聚落，或分裂为众多的制陶专业户。然而，类似的聚落和脱离聚落的专业户澧阳平原至今一个也没发现。

理由之五：中国的历史与民族学调查共同显示，以农为主，农闲务工，自给自足是中国社会手工业与农业相互关系长期的基本模式；同时，在一些民族地区的村落内部，互助也应是普通成员相互间获得对方普通手工制品的一种常规模式。

2. 关于特殊陶器的生产

以汤家岗白陶器、白衣红陶器为例。

这两类陶器在汤家岗墓地里均为有身份的人所拥有，总量不足普通陶器的 1/10；而且制

作精美，纹饰繁缛，堪称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精品，完全有可能是出自少数专业的能工巧匠。

但是，它们也并非商品经济，手工业与农业社会分工的证据。

假如这些陶器可以随意生产，可自由使用，自由交换，为制作人实现劳动的价值，那么它们就一定会被大量生产，也一定会大量出现在多数人的墓里，对外输出也一定会比现在考古发现的更多、更远。

那些陶器之所以特殊，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它们只出现在聚落墓地少数有特殊地位有特殊身份的人的墓里。它们之所以在原产地都数量嫌少，本身也说明它们不是社会日常生活的主流产品，而近似于我国封建王朝时期的“官窑”制品。

为了维护它们所具有的特殊性本质，它们不仅不会被允许成为可随意交换的商品；而且它们的生产和使用也都要受到某种社会力量的强力监控和制约。

启示：虽然手工业已出现了专门化的迹象和趋势，但农业依然是手工业的基础，而且生产资料也没有私有化的迹象。因此，手工业的专门化尽管有助于劳动者财富的私有和积累，但它的经济地位依然有限，距离农业与手工业真正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分工还相当遥远。一般而言，当时普通手工制品的生产性质总体上还是聚落或聚落群内部的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至于特殊手工制品的生产，无论种类、数量、使用目的和对象也都要受到某种社会力量的宏观制约。正因此，手工业的专门化虽然对财富私有化起源有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可能是起源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

（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 6500 年的古稻田。其中，田泥是黑色的，田埂是红土分期垒筑的。这一发现表明，汤家岗文化时期农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往的刀耕火耨广种薄收转向了精耕细作；同时还表明，在生存压力增加，工具效能低下的前提下，唯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与进步才是推动史前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否则，就无法落实和推动精耕细作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财富私有化起源的关键

（一）有关的考古现象

私有化是以聚落为历史平台而发生发展的，但史前聚落并未因此而解体。尽管聚落内部的贫富和等级分化愈演愈烈，但聚落也没有因此而解体。这表明私有化的起源与发展很可能都没有触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尤其是土地公有制。否则，聚落就没有了维持统一的基础和力量，就一定会在人们追逐利益的冲击下分崩离析。

（二）有关的出土文献

其一：殷墟卜辞

“庚辰卜，口贞，翌癸未，西单田，受^甲年。十三月”（《甲骨续存》下 166）。

俞伟超先生认为整条卜辞记载的内容就是秋收以后春耕之前，“在庚辰到癸未的四天期间，在‘西单’进行一次徙田及换田活动。”所谓换田，其可能性之一就是“重新分配土地”。

其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魏户律》

“……股（贾）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

杨宽先生的解释是：“做买卖的‘贾门’，经营‘逆旅’的店主，招赘于人家的‘赘婿’，招赘给有儿子的寡妇的‘后父’，都作为身份低下的人，不准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地房宅基。”

其三：山东银雀山汉墓战国竹简《田法》

“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

（三）有关的古典文献

《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授）田，六十归田”，“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

启示：商周至战国时期流行的“授田制”应以生产资料土地公有为基础；土地公有，定期轮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应是其基本操作模式。这种“授田制”与操作模式不仅极可能源于史前，还应与史前私有化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否则，普通聚落成员就没有财富的来源与途径，史前财富的私有化也就会缺失最广泛的最基本的社会基础，也不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普遍现象。

四、财富私有化与管理强化的关系

汤家岗墓地的管理可见三个方面：

1. 墓地整体分为南北二个墓区，中间有近 5 米的空白隔离带。
2. 每个墓区都有 A、B、C 三类墓，南墓区还有 A、B 二类中随葬物最多的墓。
3. 随葬器物一律按照统一的模式摆放，各墓都有的筒形罐一律底朝西，口向东；圈足碗或其替代品圜底钵则一律底朝东，口向西，并直接扣在筒形罐的口上，两两相对。

以上现象从不见于更早的文化和墓葬。

为何财富的私有化会给社会带来如此变化？

1. 财富私有化的起源促使聚落内部出现了以往不见的聚落集体财产的代言和管理人。
2. 聚落上层管理者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威，以及普通劳动者对风调雨顺和收获的期盼，共同导致专职宗教神职人员的出现，以及他们地位的不断攀升。

与此同时，管理的强化，聚落管理者与专职宗教神职人员的出现又进一步造成财富、私有化、权力三位一体，以及越有权越富，越有权越早富等新的社会现象；并清晰地表明，在中国史前社会真正最早具有社会和经济意义的分工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而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

结 语

1. 中国史前的私有化，本质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而是财富的私有化。
2. 中国史前的手工业并未与农业发生真正的社会分工，对史前财富私有化的起源贡献甚微。
3. 史前财富私有化的起源主要是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
4. 财富私有化起源的关键与起点就在于土地公有经营权分离。
5. 财富私有化的起源不仅导致社会组织程度与管理强化，还导致私有、财富、权力三位一体社会新特点的产生。
6. 史前社会第一次真正具有社会性、经济性意义的分工，不是农业与手工业，而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清凉寺墓地的发掘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

宋建忠 薛新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位于山西省最南端的芮城县东北部，背依中条山脉，面临黄河干流。2004年底以前，在近2000平方米范围内清理了262座墓葬，墓葬的分布、种类、死者的身份、出土的随葬品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清凉寺墓地的主要墓葬有大小两类，年代可分为先后继起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小墓，遍布整个发掘区，西部和中部较稠密。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大型墓，主要分布在墓地的中、东部，排列顺序十分规范。第三个阶段只有个别较完整的小型墓葬。墓葬的形制、头向、葬式等习俗基本相同，随葬器物也未发生质的变化，从文化分期的角度可将它们全部划归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最晚阶段。

墓葬中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别，墓主人可划分出三个不同的层次：处于社会最上层的是大型墓的墓主人，有陪葬者和殉人。第二个阶层是小型墓的墓主人，身份可能是普通成员。最低等的是那些大型墓中的陪葬者和殉葬者。大约三分之一的墓葬有随葬品，其中主要是玉石器，种类可分为琮、璧、钺、环、带孔石刀、长方形玉器、兽头状饰品等，主要器物属于礼器的范畴。另外鄂鱼骨板、兽牙和猪下颌骨等特殊遗存仅发现于个别墓葬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随葬礼器已经有了根据地位的差别而不同的定例，礼制已经成熟，但各阶层的对立的程度从不太明显到十分鲜明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清凉寺墓地的发现和发掘让我们对以前的一些认识重新思考和定位：必须正视公元前3000年之前中华大地曾经出现的“满天星斗”，它们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曾经起了的重要作用；同时应该认识到这些“星斗”并没有淹没中原地区文化的辉煌，最后汇聚了各种先进因素和理念，取得突破的仍旧是中原地区，这个过程正是通过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文化复兴实现的。

清凉寺墓地不同的墓葬以人与人之间等级区分的标志物，见证了一段我们目前认识还不十分清晰的历史，反映了远古时期一个由动荡到规范的阵痛历程，在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早夏文化研究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河南登封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发现一座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这座大城的北城墙夯土残长约370米,残高0.5~1.2米;北城壕长630米,宽约10米,深约3~4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其他面的城墙和城壕,从其所处地势和钻探情况看,可能已被破坏。在发掘中,我们还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表明该遗址的高等级并为当时的中心聚落。该城是目前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

考古工作者曾于1977年在王城岗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是东、西并列的小城址,其东城已被五渡河冲毁,所存甚少;西城的南墙长82.4米,西墙长92米,城内发现有以人为牺牲的夯土建筑奠基坑,还出土有青铜器残块。当时,发掘者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提出此城有可能是“禹都(居)阳城”之所在,但有学者认为此城太小,不大可能是禹都。

在1996~2000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们采用AMS法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推定: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址的年代(王城岗二期)相当于公元前2132年,这已是夏代始年的公元前21世纪前后。关于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和小城的关系为学术界所关注。我们注意到:从这两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岗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从两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方向大体一致;从两座城的夯土特征看,王城岗大城和小城的城墙夯土都是用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而且夯土层的厚度和夯窝的特点也是相同的,夯土墙的夯层之间都有细沙相隔,且夯窝较明显,在夯土中发现有河卵石,可见其夯土墙都是用河卵石类夯具夯打而成的;从两座城墙的包含物看,王城岗大城和小城夯土中的包含物表明都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从两座城的年代看,王城岗小城使用期为王城岗二期,而大城的使用年代则较小城稍晚。我们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与小城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有待于我们的研究和揭示。由于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的发现,为“禹都阳城”的和早夏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资料。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早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山东北部先秦时期的海盐业与社会演变

王 青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根据文献记载,山东北部的海盐业可谓历史悠久,至少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中国的主要产盐区之一,并成为山东北部古代经济长期繁荣的重要原因;山东北部的古代海盐生产以煮盐为主,晒盐是直到明清时期才兴起的。最近,笔者依据最新考古发现,对商周时期山东北部的海盐生产做了初步研究,纠正了以往文献考证的一些误解。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先秦时期的海盐业与社会演变的关系做粗浅探讨,请予指正。

一、史前海盐生产蠡测

食盐乃百味之王,是人体所需氯和钠的主要来源,“无盐则肿”。海盐生产起源于农业兴起之后,史载“夙沙氏始煮海为盐”,夙沙氏是活动在今山东半岛沿海的史前部落,说明山东沿海的海盐生产很可能在史前时期就已出现。而从鲁北全新世海岸线变迁看,广饶五村、傅家、寿光薛家岭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寿光郭井子、昌邑卜庄等龙山文化遗址,应处于当时的海岸附近,其中傅家、五村还是比较繁荣的高等级聚落。在滨海环境中出现高等级聚落,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是很难想象的,推测这些沿海聚落应与获取沿海资源的某些经济活动有关,很可能就是海盐生产。

但在经过发掘的五村、傅家和郭井子遗址,并未发现明显的煮盐遗存,如煮盐工具等。根据有关记载和民族学资料,我们推测当时可能是用树条编成的深篓或浅盘来煮盐的,外表涂抹的蚌壳粉灰能使之愈烧弥坚,不易渗漏。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推测,很可能是直接煮海水为盐,或从海沙中沥出卤水煎煮成盐。

二、商周时期海盐生产概述

《管子》曾屡次提到“煮海为盐”、“请伐菹薪,煮泔水为盐”、“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等记载,可知为煮盐而非晒盐,但对海盐生产过程没有提及。我们在2001年对寿光沿海大荒北央西周前期制盐遗址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出土了盩形陶器、粘土坑、小水沟、草木灰及其表面的白色硬面等重要遗存,其中多数是鲁北内陆遗址不见的。经采样检测分析,盩形器内壁凝结物的含盐量在10%左右,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应为成盐过程中析出的钙化物硬层;草木灰表面的白色硬面的主要成分为石英与长石,应为含盐物质(盐土)溶解后的残留物。再结合《天工开物·作咸篇》的有关记载,可以对这些遗存做出解释,即小水沟应是为了获取地下卤水而人工挖成的卤水沟,草木灰是人工摊成的“摊场”,草木灰表面的白色硬面是刮取盐土后的残留物(刮卤工具为圆形陶片),粘土坑则是用来溶解和沉淀盐土的淋卤坑,盩形器则是用来煎煮卤水的煎卤罐。

据此可复原当时的海盐生产过程:先开沟获取地下卤水,在沟边摊压草木灰,然后把卤水泼洒在草木灰表面生成盐花,以借助草木灰中的可溶性盐来提高含盐量,再把盐花刮起形成盐土,倒入淋卤坑溶解沉淀,然后以罐盛卤置于盐灶,最后煎卤成盐并破罐取出盐饼。这种制盐方法应是原始的淋煎法或淋灰法。(大荒北央遗址受发掘面积的限制,未能发现盐灶,但在沾化、龙口等地已有线索,参见《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拙文。)

三、商周时期的产盐地域与聚落形态

目前所知,在鲁北海拔10米以下的沿海地带,发现盩形器的商周时期遗址分布密集,盩

形器出土数量大,但其中多数都离当时的海岸较远(商周时期的海岸线约在今海拔2~3米一带),如寿光大荒北央、双王城和晚商时期的阳信李屋等遗址,说明不是煮海水为盐的,而应是利用地下卤水煮盐。关于鲁北浅层地下卤水的成因,一般认为是全新世高海面时期侵入现今内陆的海水,经强烈蒸发浓缩后埋藏形成的,最近的反向地球化学模拟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而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鲁北地区的全新世高海面出现在距今6500~5000年前,其海岸线位置约在现今海拔9~10米一线,与盔形器的密集分布地域基本重合。因此可推定,商周时期山东北部的产盐地域应是现今海拔9~10米一线以北地带,可视为海退时期裸露形成的大片滩涂地。更进一步说,位于此线以北出土盔形器的遗址多数应是商周时期的制盐聚落,其功能与内陆农耕聚落显然不同。(另外还能发现,《汉书》记载的山东北部产盐诸县也在此线以北,这从侧面证明了以上推测。)

根据调查,这些制盐聚落普遍面积较小,在1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可见多个集中出土盔形器的小地点,面积只有几百或几千平米,而以往认为面积几十万平米的遗址也多是由多个小地点分散构成的(如沾化杨家、利津南望参等),这应是海盐生产的季节性和灶户小作坊造成的。而发现墓葬的遗址很可能是当时的海盐集散地或盐仓所在地。这种聚落形态也是与内陆很不相同的。对商周时期的产盐地域与聚落形态的新认识,将有助于今后鲁北沿海考古工作的开展。

四、商周时期的海盐网络与社会演变

鲁北沿海海拔10米以上地带至今仍是大型盐场的分布之地,罕有粮食作物种植,人口稀少经济落后,而鲁北内陆的山前平原地带则是人口稠密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这种情况应是历史的延续。由此推之,商周时期的山前平原地带应是农耕聚落和人口稠密之地,这里既是海盐的主要消费区,又是产盐区所需粮食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供应区。大荒北央遗址的发掘表明,该遗址下层出土的盔形器以夹砂红褐陶为多,应是当地所产,而上层出土的盔形器以细砂灰陶为主,与内陆遗址出土的陶器很相似,应是从内陆地带输入的(目前已在青州赵铺遗址发现了烧制盔形器的陶窑)。这种情况说明,鲁北内陆与沿海之间存在一个以海盐为中心的资源控制与流通网络,并且是逐渐得到加强的,其背景应与周初齐国实行的“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政策有很大关系。

盔形器的器形与纹饰极为特殊,有学者人认为源自晚商时期的殷墟,但也可能仿自某种类似器形的编织器。而实际上在鲁北沿海地带的滨州兰家、惠民大郭等地已经发现了晚商青铜器,很可能出自墓葬,说明商人在这里的真实存在。进一步推测,商人进入山东北部的原因很可能与获取海盐等战略资源有关,鲁北内陆的济南大辛庄等中心聚落则可能发挥着集散这些战略资源并输往中原的重要作用。周代齐国对海盐资源的控制更为严密,春秋早期就已实行官营,这是齐国走向强盛的重要原因,都城临淄则是当时山东地区最大的海盐集散地。而《管子》所载“请以令 棗翟 之梁、赵、宋、卫、濮阳(淮阳?)”,更说明齐国海盐已经销往中原诸国。近年有学者重新甄别出8枚“徙盐之玺”,是战国时期齐国在海盐流通过程中使用的官印,其使用地点多在齐国南境(详见《考古》2004年8期赵平安文)。这一重要发现证明《管子》的记载不伪,战国时期山东北部的社会演变与海盐控制与流通网络的关系更加紧密。

Regional Systematic Survey and Settlement Archaeology Studies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the Rizhao Area: Possible Models for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Anne Underhill

The Field Museum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s a valuable tool for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of Longshan sociopolitical systems in the Haidai area. After completing ten seasons of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the Rizhao area of southeastern Shandong, our Sino-American team has covered an area 947.7 km² in size and has discovered over 400 Longshan sites.

Two previously identified sites are major centers, Liangchengzhen in the north and Yaowangcheng, 31 km to the south. There is a four-tiered settlement hierarchy in the surveyed region for both the early and middle Longshan periods. This complex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developed rapidly, judging from the great increase in quantity of sites from the late Dawenkou (24) to Longshan (425) periods in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areas.

New immigrants may have arrived with an already complex form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at was quickly adapted to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rea. A key ques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address is whether there was one large polity in the region, or whether there were two separate polities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We propose that the different settlement patterns around each center indicate variation in elite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control over surrounding areas.

The clear four-tiered settlement hierarchy in the region could represent development of an incipient state, but other forms of evidence are needed to demonstrat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Further survey and excavation in the Rizhao area are needed to reveal material evidence for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by elites at one or both centers over the surrounding settlements.

How Systematic Settlement Pattern Survey Revolutionized the Study of Complex Societ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Gary M. Feinman and Linda M. Nicholas
The Field Museum

Over the past 50 years,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complex societies has expanded beyond mere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o address questions of how these hierarchical socioeconomic networks arose, changed over time, and varied from one world region to another. This expanded agenda has enabled archaeology to become more than a source of artifacts for museums or a way to verify later documents. After all, only archae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tell us how, where, and why the first chiefs, cities, states, and markets arose in each global region. The expanded agenda and the increasing richness of archaeology has been fostered by many factors, but few or non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mergence of systematic settlement pattern studies. This paper draws on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from several areas of the world to illustrate how settlement archaeology was a key to answering important and long-stand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ast while it also has opened new issues of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海岱地区以城为中心的聚落形态

宋 建
(上海博物馆)

海岱地区龙山时期的聚落形态以城为中心。以日照地区为例，区域聚落中心是丹土和两城。丹土遗址范围 130.7 万平方米，城垣范围 25 万平方米，两城遗址范围 246.8 万平方米，城垣范围还不清楚。城内都发现夯土基址。两城和丹土相距仅 2 公里，在龙山文化早中期共存。日照地区的聚落形态由若干等级的聚落群和聚落体现。两城和丹土集区域中心和最大聚落群中心为一体，其余各聚落群内均以一最大者为中心。目前只发现区域中心有城垣。

类似于日照地区的聚落形态在海岱地区还有多个，最大的聚落中心是阳谷景阳岗和茌平教场铺，二遗址均有城垣，围绕范围各达 40 万平方米。

两城等聚落中心目前只能看作是小区域内的中心，而整个海岱地区的单一的社会政治中心尚未形成（未发现）。

比较而言，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在其繁盛时期拥有单一的最高政治中心——良渚瓶窑地区。在良渚文化分布区内，聚落形态表现出清晰的金字塔等级结构，最高中心之下还有像福泉山、草鞋山这样属于较高层次的次级中心，其下还有若干等级的聚落。两级中心聚落与其他聚落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以宗教为纽带维系，而地理关系不如日照地区清晰。

山西垣曲盆地的聚落考古研究

佟伟华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

一、课题背景

通过开展区域调查所进行的聚落形态考古,以研究人类社会为目的,这种方法通过对古代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人们所建立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最终达到复原古代社会的目的。本课题力图对垣曲盆地内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二里岗文化期的聚落演变做全面的梳理,以分析社会形态、组织结构的变迁过程,即揭示从农业的发生、定居、聚落的开始到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整个演变进程。

目前,在垣曲盆地内开展聚落考古研究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

1. 垣曲盆地复杂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 230 平方公里的范围,是进行聚落考古的理想区域。

2. 垣曲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具有悠长连续和相对独立的特点,自史前时期至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绵延不断,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3. 垣曲盆地具有 50 年考古发掘和调查资料的积累。

4. 垣曲盆地内已初步构建起从史前到商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和较小尺度的考古学分期的时空框架,奠定了进行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学术基础。

5. 本课题的参加者对垣曲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具有深入的了解,具备了以辨识陶器特征为据进行器物分期以及综合研究的能力。

6. 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大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聚落考古研究已在我国许多地区展开,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二、课题实施的方法

1. 本课题研究时空范围的设定

(1) 地域范围

(2) 年代范围

2. 本课题技术路线的设定

3. 本课题的调查方法

针对垣曲盆地存在多种复杂地形的特点,全覆盖式的区域调查方法在这一地区并不能完全适用,我们采用了区域调查与国内传统的考古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使点、面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调查工作以一个遗址为基本单位,运用勘察、测量、钻探、断面清理、采集遗物等手段,对各遗址的存在形式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全面的收集。

4. 本课题的具体操作

(1) 以河流区划为界的全面踏查,完成遗址确认

(2) 遗址的平剖面调查和遗物采集

(3) 点与面结合,选择重点遗址试掘

(4) 地形地貌与生态环境考察

5. 遗址记录

6. 运用图表和文字对各遗址所获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三、垣曲盆地概况

垣曲盆地位于晋南黄河北岸，中条山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 140 余公里，矗立于运城盆地和黄河谷地之间，垣曲小盆地便坐落在中条山南麓，黄河沿盆地南缘由西向东流过，晋、豫两省在此以黄河为界。盆地的东部为太行山和王屋山，西部隔中条山与运城盆地相邻，南为黄河及崤山，形成由中条山、王屋山与崤山围限的山间小盆地。

垣曲盆地是我国最早知道的老第三纪地质之一，是一个独立的地貌单元，笼统地称之为垣曲盆地。盆地范围内及其周边地区的水系极为发达，黄河以南的支流有涧河及东涧，黄河以北的支流有五福涧河、板涧河、亳清河、沅河和韩家河，最东部为西阳河。沅河与亳清河就在盆地底部的古城东南交汇后注入黄河，形成了一个狭小的冲击扇。垣曲盆地即以这个冲击扇为中心，分别延展至黄河南岸及其北岸的较宽阔的河谷地带。河道两旁形成面积大小不等的冲击小平原和台地，地势较平坦。现代村落及古代遗址的大部分就分布在这三条河流两岸的二、三级阶地上。盆地的海拔高度为 200 米~460 米。

四、初步研究成果

在对垣曲盆地各遗址所获的信息综合分析以及对聚落群进行了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使以下课题的研究有所深入：

1. 通过对垣曲盆地史前至商代的 85 个遗址的面积、规模、文化层堆积、文化内涵、文化遗迹的分布与种类等信息的了解，对每个遗址包含的各不同时期聚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确认，将具有共时性的聚落进行比对和归类，明确了垣曲盆地内各时期聚落的数量、规模及宏观布局。

2. 考察了具有共时性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各不同期聚落进行了分群研究并考察了聚落的等级差异以及中心聚落与不同等级聚落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明确了各不同期聚落群的分布形态以及能够反映出的社会组织结构。

3. 通过对各时期中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的布局、年代、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微观研究，探讨了以中心聚落为代表的各期聚落的基本形态，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功能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结构状况。

4. 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汇集了各时期聚落的分布资料，从宏观上把握各时期盆地聚落群的分布状况，在对这些聚落群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各不同期聚落的数量、规模与人口的变化、聚落群分布的移动轨迹，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心区的移动和变化，重点揭示当时社会的演进过程，即揭示从农业的发生、定居聚落的开始到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整个变化过程，同时尽可能地涉及到聚落研究的其它方面。

5. 通过对每个聚落地理环境、微地貌特征的了解，考察同期聚落所处的地貌特征的异同，探讨各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总之，本次聚落考古研究是以全新的视角进行的新的尝试，极大地拓宽了研究领域，确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一工作推进了垣曲盆地古代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对于探讨这一小区域与山水毗邻的中原腹地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产生的背景、基础与过程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许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遗址是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一处超大型聚落。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 3800~3500 年。自 1959 年发现以来，发掘工作持续不断。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它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其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一般认为，这里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因其存在时间和所处地域与古典文献中所载夏、商王朝大致对应，成为探索中国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对象。

近年，围绕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我们将探索二里头遗址尤其是其中心区的结构布局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同时，又对其所在的洛阳盆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这种“点面结合”，即中心性都邑遗址的勘察发掘与周围聚落群调查和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使我们得以在数年内有限的田野工作中获取了较多的有关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与入地关系等方面的信息。

一、二里头遗址布局结构的探索

最新勘察结果表明，遗址的现存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由中心区与一般居住活动区组成。以宫殿区为核心的中心区域位于遗址东部。我们在原来已知的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发现了宫城，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晚期大型夯土基址群的存在。此外，还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葬、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宫殿区外围发现的四条大路宽达 10 余米至 20 米左右，长期延续使用。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面积达 10.8 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 9 座。发掘确认二里头文化早期即有多重院落的大型夯土基址，晚期的宫城内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遗址，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二、二里头遗址周边区域的系统调查

2001 年至 2003 年，我们对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洛阳盆地中东部进行了系统踏查，踏查面积约 638 平方公里。调查的遗存年代跨度限定在先秦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至战国时代。调查中新发现遗址 174 处，占该区域已发现遗址总数的 78.4%。此外，我们还对调查区域内的古河渠遗迹以及地貌与人类遗存分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

从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看，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自史前时期以来一直属人口密集分布区，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遗址的面积仅 60 余万平方米，而超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上述田野工作及进一步的研究，对探索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它也通过在古今人口稠密区的考古实践丰富了系统区域调查的方法论。

中国北方干旱区考古遗址植物遗存及对环境变化的探讨

孔昭宸 张芸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本文选取地处新疆天山北坡的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小西沟考古遗址剖面 and 邻近的桦树窝子自然剖面进行较高时间分辨率的孢粉分析和比较, 结合序列的 ^{14}C 测年和对遗址灰坑中炭化木 (Carbonization wood) 进行电镜显微结构鉴定, 揭示出在 2000~1300aBP 时段, 曾出现过雪岭云杉 (*Picea schrenkiana*) 花粉的峰值 (分别达到 20% 和 35% 以上)。通过对天山北坡不同植被带表土和大气云杉花粉传播的对比研究, 不仅揭示出雪岭云杉林线较今下移有 300 余米, 而且遗址灰坑中的雪岭云杉炭屑及 AMS 测年亦表明当时先民们是从遗址附近采集的薪柴, 由于历史气候变化和先民们活动, 使该地环境较今发生了很大改观。

从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部的伊金霍洛旗杨家湾保留的古土壤剖面进行的孢粉分析、炭屑含量统计、全碳及 PH 值测定, 结合序列的 ^{14}C 测年以及邻近考古遗址朱开沟文化期器物中的石斧、袋足鬲、三足瓮、折肩罐等的比较, 可以揭示出毛乌苏沙地 4000 余年来的古环境变化及人地关系, 其中炭屑 (Charcoal fragment) 作为火的产物可以揭示遗址附近周边地区自然火或人为火的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对植物和环境的影响。

三个地点研究结果均表明, 考古遗址单纯地孢粉分析对环境的解释有其局限性, 与邻近文化期时段可以对比的自然剖面高时间分辨率的综合资料对比, 才能更好地补足遗址局地 and 区域范围的环境考古学证据。

对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植物遗存研究的思考和讨论

孔昭宸 刘长江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基于包括前仰韶、仰韶和龙山文化期的时段, 正处于中国历史气候的大暖期(8.5~3.0kaBP), 众多研究资料揭示, 其间大致经历过8.5~7.0kaBP的波动升温期、7~6kaBP暖湿期、6~5kaBP的降温期、5~4kaBP较稳定的温暖期及4~3kaBP的气温波动下降期。历史气候的变化和环境改变, 无疑会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程中打上烙印。其中在遗址的聚落、城址、房址、墓葬、窖穴、灰坑和围沟中找到的具有显著形态学特征的植物果实和种子, 将有助于探讨先民们的经济活动和局地范围的植被组成, 如能再结合微观植物(孢粉、植物硅酸体及炭屑)和伴存动物遗骸研究, 更助于探讨先民们经济活动与环境关系。

近年来, 以果实、种子和木材为代表的植物遗存被考古工作者大量发现在前仰韶文化期的湖南澧县八十垱、彭头山, 河南的舞阳贾湖、浍池班村, 甘肃秦安大地湾以及内蒙赤峰的兴隆洼; 相当于仰韶文化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浙江余姚河姆渡以及沈阳新乐; 龙山文化期则见于甘肃民乐东灰山、山东滕州庄里西、日照两城镇和嗣后的河南驻马店杨庄和洛阳的皂角树。

通过对不同文化期植物果实、种子的鉴定及其所属植物母体的现代分布、生境和用途的分析以及各文化期遗存的比较, 不仅可以揭示中国新石器时期广义上的原始农业(粮食、果蔬、药材和油料等)的起源、发展和传播, 而且可探讨先民们生存自然环境、农业经济活动和饮食习俗。按遗址植物的生活型有常绿和落叶阔叶乔木, 如栎、朴、胡桃楸、川楝、樟、榛和君迁子等; 灌木、亚灌木有酸枣和荆条等; 攀援木本(野葡萄、猕猴桃和悬钩子等)、缠绕草本(栝楼和菟丝子等)、旱生草本(狗尾草和藜等)、湿生草本(野大豆、野薄荷、苔草、莎草和酸膜等)、水生草本(菱角和芡实等)。按其用途可涵盖粮食作物(稻、粟、黍、豆、麦、薏苡、高粱和大麻等)、果实类(菱角、芡实、梅、桃、李、杏、猕猴桃、山里红、蓊蓊葡萄、枣、胡桃和君迁子等)、草本蔬菜类(芸苔、苋、葫芦、冬瓜和香瓜等)、健体及药用(紫苏、山茱萸、栝楼、薄荷、黄芪、天胡荽、忍冬和川楝等), 此外还有不少尚不知可能用途的杂草。新石器时代早期, 先民们总是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渔猎、采集为主, 丰富的食物来源, 加之人的能动性已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而在新石器中晚期, 尤其在5.0、4.0和3.0kaBP出现的环境事件, 驱使地人关系协调、聚落和城址扩大、人类群体增加, 加之人为性砍林、垦草、农业发展和动物人工饲养、自然资源难以自然修复, 从而加剧了长江、淮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农作物和饲养动物物种的改变。

报告在结合图表论述中国原始农作物具有悠久性、地理分布的广域性、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多样性的同时, 还对中国新石器考古遗址中的植物遗存发现的不均衡、物种鉴定的不确定以及原始农作物的起源和传播途径予以思考, 如世界栽培的最重要的农作物小麦(*Triticum aestivum*)在中国真的只有5.0kaBP历史吗? 中国健体治疗功能中药材是否早已出现呢? 大豆、荞麦及一些果蔬类还能在哪些遗址中被发现? 礼仪之邦常用酒表述盛情的酒所用原材料是否清楚呢?

总之, 作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剧的龙山时代、人地关系冲突、协调, 将为环境考古工作者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基于小流域系统的史前人地关系研究

——河南孟津寺河南仰韶~龙山时期环境演变与文明演进

夏正楷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世界上古代文明唯一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地区,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其他地域所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孟津寺河南全新世早~中期史前文化遗址众多,湖沼堆积和黄土-古土壤发育,利用该小流域内古环境信息丰富,人类活动频繁、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之间关系密切的区域优势,以史前小流域人类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剖析系统内自然环境各要素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环境演变,尤其是重大环境事件对史前人类文化演进的影响、史前人类对环境演变的适应以及史前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史前小流域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构建该地区史前人地关系的基本模式和演变机制,揭示中原地区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环境背景。

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尺度及其在环境考古中的应用程度

杨晓燕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考古系)

地质学中将距今一万年以来的这段时期称为全新世(Holocene)。在这一万年来,人类社会也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历史时期,进入到工业社会,直至今天的信息时代。当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的时候,研究人地关系的发展历史成为一种必然,无论从地理学的角度还是考古学的角度,环境考古都成为一个日益受到重视的研究方向。

在早些时候,科学家发现格陵兰冰芯上部1500m的 $\delta^{18}\text{O}$ 值十分稳定,即全新世一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是稳定的。但随后几年,来自海洋、湖泊沉积物证明,全新世气候在间冰期的气候背景下,呈现高频振荡的波动特征。在千年尺度上,在北大西洋的沉积物中,发现全新世共出现8次冰川漂移事件(冷事件),峰值出现在距今1.4ka、2.8ka、4.2ka、5.9ka、8.1ka、9.4ka、10.3ka和11.1ka,呈1.5ka的周期。国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全新世大暖期进行了研究,并注重8200a、4200a、明清小冰期等极端气候事件研究。在十年尺度上,EI Nino的发展、影响也成为全球气候学家研究的重点。

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在千百年尺度上、十年尺度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环境考古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环境考古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存在以下不够完善的地方:(1)“两张皮”式的研究,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与考古发掘完全脱离,尤其是古环境的重建;(2)“曲线”式研究,气候变化一条曲线,文化变化一条曲线,两个曲线加以对比就是环境考古;(3)重气候而轻地貌,环境考古更多的关注当时文化的冷暖干湿,而忽视地貌变化的影响;(4)重宏观而轻微观,缺乏具体遗址的环境背景研究,多大区域的文化背景的讨论。

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以下建议:(1)开展“目的性”研究,消除“两张皮”工作方式:环境考古需要和考古发掘一起进行。环境考古不仅仅是实验室工作,尤其是地学考古。环境考古应该有更明确的目的性。(2)提倡“机制”性研究,超越“曲线”式研究:从考古遗存中寻找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证据。(3)开展点一线一面的工作模式,建立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思路。(4)关注地貌过程:全新世气候整体上是小幅度波动的。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变化对文化的影响,时空不同,影响程度也不同,有的属于敏感地带有的属于稳定地带。大部分情况下气候变化不能对人类活动产生质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地貌过程对古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小地貌(山坡、河谷、阶地、冲积扇、泛滥平原、海滨、沙漠、冰碛等等),都是持续演变到现在的地貌,与人类生活发生极密切的关系。(5)关注极端事件(极端气候事件:干旱、洪涝等;极端地质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对古人类文化的影响。

总之,环境考古是考古学与地学产生的一个交叉研究方向,环境考古研究要做好,考古学界和地学界的紧密合作是前提;要促进考古学与地学学科间的互相了解与交流,正确认识中国环境考古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环境考古还处在资料积累阶段,盲目地去分析一些大尺度上的人地关系是不可取的),进而循序渐进发展地发展中国的环境考古研究。

史前东方海岸变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方法

高蒙河 刘志岩
(复旦大学文博系)

史前海岸线变迁研究是我国海疆考古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了解史前人地关系和早期国家演进,具有不应忽视的作用和意义。半个世纪来,这个课题一直得到大家的关注,有关资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

一、史前东方海岸线研究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50~60年代的初始期。研究比较零星,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沿岸,研究手段较单一,研究成果多依据间接资料,并未做实地调查,错误较多。

第二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末的发展期。研究明显加强,文章逐年递增。包括对海相沉积、贝壳砂堤、海蚀遗迹及考古材料的应用,研究手段日益丰富。但前期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80年代中期始,长江下游平原海岸线研究逐渐提上日程。本阶段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海岸线变迁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描述,而是对变迁的动因加以研究和解释。

第三阶段:90年代来的反思期。由于以往对环渤海沿岸研究较成熟,因此本阶段开始对这个区域的研究多加检讨,并在新材料涌现的情况下,纠正了前期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这一阶段起,长江下游海岸线变迁的研究开始成为的焦点。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加入这一研究行列。

二、史前东方海岸线研究的四区域

1. 海湾沿岸
2. 山东半岛沿岸(包括莱州湾和胶州湾)
3. 鲁南苏北(海州湾)
4. 长江中下游平原沿岸

每一阶段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致呈由北到南的趋势。

三、史前东方海岸线研究的现状

1. 研究范围需要整合

以往对海岸线变迁多是分区域进行研究,因此关于史前海岸线的描述是断续的,不完整的,今后应建立在更大范围上。

2. 学科交叉需要融合

研究中尽管呈现多学科交叉模式,但在实际中地质学家对考古材料的把握和考古学家对地质材料的运用多差强人意,甚至只是对两种材料的人为拼合。

3. 技术和理论需要更新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得以应用,但并未在研究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于海岸线变迁解释的理论水平尚停留在80年代,急需加强和改进。

4. 强调材料的客观性和解释的多样性

史前海岸线的研究不同于历史时期可以借助文献,考古材料和地质资料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解读这些材料的能力也因人而异。因此在运用其进行研究的时务必要根据材料说话,避免人为演绎。在材料不整或有疑问处,绝不能人为划定某一时段海岸线。

海岱地区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旱稻混作农业经济

赵志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探讨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与发展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考古出土的各种遗迹遗物中,能够直接反映古代农业经济特点的是谷物遗存,浮选法是获取包括谷物在内的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近些年,我们在鲁东南的两城镇遗址和皖北的尉迟寺遗址分别开展了浮选工作,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为探讨海岱地区南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特点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两城镇是一处龙山时代的遗址,尉迟寺包含有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时代的文化堆积,在这两处遗址的浮选结果中都发现有粟、黍和稻谷等谷物遗存。

粟类作物是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作物,稻谷是南方稻作农业的代表作物,这两类谷物遗存的同出引出一个问题,即这两个遗址当时的农业经济究竟应该属于北方旱作农业系统还是南方稻作农业系统?通过对这两处遗址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发现,稻谷和粟类作物在出土植物遗存群体中所占的比重都很高,二者之间相比较,不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出土概率上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由此说明,这两类作物在当地的种植制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根据这一分析结果,再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特点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我们认为,海岱地区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经济是以旱稻混作为特点。

(上接 53 页)

明社会过渡,关键是确认古国的诞生。古国脱离于部落,古国必有统治阶级中心和疆域。统治中心一般是城,原始城市或大型中心聚落。早期的聚落群可能是某些部落的遗存,许多聚落群将发展成古国。在探讨这一区域古国的问题,张学海先生对莒地龙山文化遗址分为五个等级和四个聚落群。龙山一群的中心聚落应在莒县南半部龙山文化遗址集中区域之内。龙山三群的中心聚落应是面积 52 万平方米的尧王城遗址。龙山四群中的两城镇遗址面积 100 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心聚落。

6. 海岱龙山文化社会性质和族属。龙山文化属于古国时代,出现邦国林立局面,龙山后期,许多古国发展成放国。龙山文化时期,聚落迅猛增长,我市区域龙山文化遗址就达 183 处,据专家研究表明,陵阳河古国诞生以后,发展成为莒县中南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龙山古国,同时在其北面河谷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两城、尧王城等四个龙山古国。

自 1995 年以来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展开以两城遗址为中心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在两城遗址中部偏西位置发现较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因此两城遗址很可能存在龙山时代的城墙或者是大型台基式的建筑物。结合两城镇过去出土的玉器和蛋壳陶器来看,这一带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但是宗教祭祀中心。

从上列举的文明要素,充分说明这一区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和发展中心之一。龙山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多,此时加速私有制统治阶级贪欲、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日趋激烈,形成金字塔式的政治中心——“都城”,也就是国家的产生。从而说明日照地区龙山时代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论断是正确的。

史前猪的圈养方式刍议

霍东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距今 7000 年前,史前人们已经开始饲养家猪,当时的人们是如何饲养家猪呢?目前对于商代的养猪方式尚不清楚。本文将汉代的养猪方式分为“溷厕相分”、“溷厕合一”、“放牧”三类,从而在此基础上追溯史前时期人们的养猪方式。

史前养猪的历史可以分为“家猪的起源时间”、“家猪的出现时间”两个阶段,在“家猪的出现时间”的阶段中将有关猪的遗迹分为五类:

A 类:祭祀坑,依其具体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四类。

B 类:与“猪圈”有关的遗迹。目前虽未发现明确的“猪圈”,但在一些灰坑中却发现大量钙化的粪便,为我们寻找“猪圈”提供了某些线索。

C 类:猪由于某种原因死后,利用低洼处将其掩埋,或就地挖坑掩埋。这种将猪埋入地势低洼处或就地掩埋的行为,可能是猪非正常死亡后,当时的人们利用地势的低洼处或就地挖坑将其掩埋。

D 类:垃圾坑。从猪骨出土于近坑口的位置来看,猪应是在其死后才弃置在坑内的,结合填土中包含较多的陶片等情况分析,推测可能为垃圾坑。

E 类:性质不明的灰坑。在此类坑底部往往发现有不完整的猪骨架,应是史前人类有意埋入的,至于埋入的原因,目前我们还难以作出判断,暂且存疑。

通过对第二阶段中“猪坑”的分类分析,推测 B 类“猪坑”为猪圈,可能反映了这一阶段的人们采用地下圈养的方式来饲养家猪,亦即挖坑或利用废弃的窖穴来对家猪进行圈养。由此可知,史前~汉代人们养猪方式的演变规律为:地下圈养→地面圈养,这与人类的居住形式从地穴、半地穴→地上建筑的演变规律大致相似,据此可知地下圈养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养猪方式之一。

在史前考古发掘中,目前与厕所有关的遗迹现象发现较少,这可能与发掘面积或当时人们随地便溺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们发现史前遗址中有些灰坑曾经作为猪圈来使用,结合汉代“溷厕合一”的圈养方式来看,推测当时可能也存在有“溷厕合一”的圈养方法,但并不排除其单独作为猪圈的可能性。

本文对史前时期人们的养猪方式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然而关于开展史前人们养猪方式的讨论,关键还在于田野考古中辨识与饲养猪有关的遗迹等现象。这一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讨论家猪的起源时间,以及家猪饲养与农业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的组织结构。这一研究的开展还会有利于我们对史前聚落布局的进一步研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较多的坑穴内埋有完整的猪骨骸,有些学者往往简单的将其归纳为祭祀的遗存。我们通过对这类遗存的分类分析来看,其实这类遗存所包含的信息远比我们想到的或现在观察到的要复杂,因此对于这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而且这也需要在田野发掘时注意各种迹象以及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正确地解释这类遗存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猪在圈养过程中坑底会积有猪粪、残余的食物碎屑等有机物,所以在发掘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近坑底土的土质、土色的变化,有条件的话,可适当采集少量的土样进行化学分析。

日照地区龙山时代考古世纪述略

杨深富

(山东日照市博物馆)

一、拉开日照史前文化研究工作的帷幕

1931年11月4日,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这是山东第一个专门性的考古学组织。1934年春,王献唐先生(日照大韩家村人)参加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山东东南沿海一带的文物调查,在诸城、日照等地发现两城镇、丹土等九处龙山文化遗址。这些调查,标志着我市文物考古工作的开端。

1936年1月,由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山东古迹研究会对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为了解龙山文化概貌和确立龙山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位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建国以来,我市重要龙山文化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

1954年7月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日照两城镇7个文化遗址,并与当地研究保护措施。

1958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对日照两城镇进行勘探和试掘工作。

1963年秋,山东省博物馆首次对陵阳河遗址进行试掘。

1973年春、秋,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首次发掘了东海屿遗址,后于1975年秋,该单位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再次进行了发掘。

1978年秋、1979年春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同各县文物干部两次对尧王城遗址进行发掘。

1979年4月,省博物馆对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进行强求性发掘。10月对该县店子乡大朱村遗址进行发掘。

1983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试掘莒县杭头遗址。

1992、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两次发掘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

1989年、1995年至2000年期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五莲丹土遗址进行六次发掘。

1995年以来,山东大学、日照市博物馆、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组成中美两城考古队,对两城镇遗址进行3次发掘,并采用“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工作。

三、对海岱龙山文化的认识与研究结果

1. 关于对“龙山文化”的认识。上个世纪30年代对两城镇遗址的发掘,以及50年代的相关研究对研究鲁东南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2. 海岱龙山文化类型划分。80年代之前,龙山文化被划分为两城镇(或鲁东类型)和城子崖(鲁西类型)。后又有三个类型、六个类型的划分方案。

3. 海岱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主要特征。龙山文化是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同时,在石器、玉器也具有显著特色。

4. 海岱龙山文化的上限与下限有关问题。

5. 日照区域尧王城类型龙山文化形成四大聚落群。1985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新概念,作为把区系类型理论为实践的中心环节,实质上把文明起源研究作为学科的重点。张学海先生认为消化“古文化古城古国”新概念过程中,核心是解决由原始社会向文

(下转 51 页)

日照地区龙山文化建筑墙体的营建技术

刘红军

(山东日照市博物馆)

本文通过相关发掘资料,论证日照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墙体的营建技术。考古资料证明,日照地区的建筑技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进入成熟时期,龙山文化时期进入鼎盛时期,表现在墙体营建过程中的加固技术和营建后的保护技术日趋成熟。这些技术可以细分为城墙夯筑、土坯垒筑、木骨泥墙、土石垒墙技术和墙体加固技术等。

夯筑技术是一种利用夯具把土逐层捣实的建筑技术。日照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夯筑技术已广泛运用到房址、窑址和城址等建筑中,代表着当地新石器时代墙体的营建技术已进入建筑领域先进行列。

土坯垒筑技术是用事先做好的土坯,砌建房屋墙体的建筑技术。砌法采用平铺横砌,层与层错缝相砌,中间涂抹粘泥,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期文化中的重要发现。它的运用,证明日照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在建筑技术领域已达到新的高度。

木骨泥墙技术,一般先挖槽后埋入木柱,木柱都埋得比较密集,密集の木柱之间的空隙再填入细小的树枝,最后在密集的立柱和树枝等材料构成的缝隙中抹上粘土形成墙体。现有材料表明,进入龙山文化时期,日照地区木骨泥墙技术的运用已不再是主流,已逐渐淡出建筑技术领域。

土石垒墙技术是一种用粘土夹石块砌墙的墙体营建技术。其营造的方式为,先把石块平铺好后再垫上(抹上)黏土,然后再平铺一层石块后垫上(抹上)粘土,逐层筑成墙体,或者先垒好一层石块,垛上泥,然后再垒上一层石块,垛上泥,逐层筑成墙体。

草拌泥技术是在粘土中夹杂植物的根、茎、叶等,以确保墙体坚固性的营建技术。墙体加固技术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挖基槽筑地基技术;二是立柱加固技术;三是斜坡护墙技术。

由上述材料可知,日照先民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建筑理念,已具非常高的水平,某些方面还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很多技术甚至一直影响着当今建筑领域。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本刊为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创办的不定期刊物，旨在反映近期国内外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刊载与此相关的发掘快讯、研究动态及相关论文摘要，以便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一、征稿内容

本刊设置中心动态、学术研究、田野简讯、读书评论四个栏目。具体内容涉及考古学的理论探索、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聚落形态演化、古环境与气候变迁、人类生业模式以及文化交流互动等方面。

二、来稿要求

1.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单位、地址、邮编、电话、职称(职务)、研究方向。
2. 论文、简报一般不超过 3 千字，书评 1 千字以内。请同时提交英文题目及 200 字左右的英文摘要。
3. 来稿请附电子版，或直接用电子邮件投稿。
4. 稿件一经发表，赠本刊一份以代薄酬。

三、通讯地址和咨询电话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250100

电话：0531 - 88369989/88366149

传真：0531 - 88565268

电子信箱：arc@sdu.edu.cn

网址：www.arc.sdu.edu.cn

Newsletter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Research

Volume 5 , Dec. 2005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chaeology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27 Shanda Nanlu

Jinan, 250100

China.

Tel: 86-531-88369989/88366149

Fax: 86-531-88565268

Email: arc@sdu.edu.cn